

敵人或盟友： 省港罷工的商人因素與政黨策略*

李達嘉**

摘 要

1925年6月，中共為了聲援上海五卅運動，在廣州和香港發動省港罷工。罷工運動因為沙面事件而擴大，廣州和香港都對對方進行經濟封鎖。廣州中共黨團主導運動的方向和策略，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國民政府給予大力支援。罷工運動使國民黨左派和中共的權力擴張，引發國民黨右派的危機感，經濟封鎖招致廣州商人不滿。國民黨右派與商人聯合採取行動，要求政府調整策略，減少對商務活動的管制。工人部長廖仲愷被暗殺後，中共一方面協助國民黨左派翦除廣州的右派勢力，一方面提倡工商聯合，對商人讓步，以拆毀右派的群眾基礎。運動的方針也從原來的全面反帝轉為「單獨對英」。對外以及經濟策略的轉變，使廣東能夠擺脫香港的經濟掣肘，走向「經濟獨立」。右派領袖離粵後，國民黨中央幾乎為中共完全把持。至中山艦事件發生，廣州政情丕變，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地位受到威脅。1926年10月，北伐軍進抵長江流域，需要全力支援，中共和國民黨中央因此決定結束罷工。省港罷工期間，中共靈活運用統一戰線策略，視廣州政治情勢的變化進行調整。本文對省

* 本文承蒙國科會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NSC-98-2410-H-001-011-），謹此致謝。初稿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宣讀時，承蒙陳永發院士、陳耀煌教授及所內諸位同仁惠賜高見，使筆者對問題有進一步思考。復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極為精闢的意見，協助筆者修改出版，筆者衷心感謝。同時也要感謝詹怡娜小姐協助蒐集、整理資料。

** 收稿日期：2012年5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8月1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港罷工策略與國民黨左、右派及廣州商人之間存在的複雜關係有深入的分析。

關鍵詞：省港罷工、商人、統一戰線、國民黨、中共

一、前 言

省港罷工從 1925 年 6 月展開，到 1926 年 10 月結束，長達十六個月之久，是國際性罷工運動史上最長的罷工之一。¹由於罷工切斷了廣州和香港的交通，使得廣東不得不尋求經濟獨立，從而擺脫了對香港的依賴。廣東經濟的發達，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北伐提供充分的奧援。抵制運動向全省擴展，也加強了國民政府在廣東的權威。省港罷工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確實帶來好處。²而從另一方面看，此一由中共所發動的罷工，如果沒有國民黨的支援，絕對難以持久。鄧中夏在罷工開始時便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幫助，「罷工不到一個星期便要垮台」。³劉少奇也說：「廣東因有政治的自由，及有國民黨幫助農工運動，所以粵港罷工，尚能再接再勵，堅持下去。」⁴如果對照五卅慘案後中共在上海的罷工運動，因為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援，又受到奉系的鎮壓和英方的反制，僅持續了三個多月，更加可以明瞭國民黨的經濟和政治支援，是罷工能夠持久的最重要關鍵。而中共藉著國民黨支持罷工，在廣東迅速擴張勢力，極力吸收工人入黨，其獲益則又較國民黨為大。⁵

不過，省港罷工也不像表面上看來的那麼風光。早在 1925 年 9 月下旬，罷工進行約三個月的時候，國民黨便希望罷工能夠結束。這比 Chesneaux 所

¹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 H. M.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95.

²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8.

³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8），頁 239-240。

⁴ 劉少奇，〈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政治週報》（廣州），期 14（1926 年 6 月 5 日），頁 12。

⁵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上冊，頁 184-185。

說，在 1926 年 4 月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便被要求提出與香港協議結束罷工的建議，顯然還要早得多。⁶罷工在當時無法結束，是因為香港和英國不肯讓步，而非來自工人的堅持。更進一步去看，與罷工同步展開的對外經濟絕交，在 1925 年 7 月底，也就是罷工才進行一個多月的時候，已經因為廣州內部的反對意見而不得不做調整。發給商人做為運輸貨物憑證的特許證撤銷，也是不得已的措置。罷工運動雖然是中共主導，但是顯然受到國民黨右派和廣州商人力量的牽制，使得最初中共所高舉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撤退到「單獨對英」，並因而開啓了廣東經濟獨立的契機。由此看來，廣東經濟獨立的窗口，又是國民黨右派和廣州商人所衝撞出來的。

在省港罷工的這段歲月，廣東政局可謂在驚濤駭浪中渡過：國民政府成立、廖仲愷被刺、胡漢民和許崇智被迫離粵、西山會議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禁止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重要職位的整理黨務案。這些事件，一波接著一波上演，對國民黨和廣州商人來說，它其實是一段令人驚心動魄的動盪歲月。這一切起因於中共進入國民黨的組織以後，鮑羅廷和共產國際在國民黨內製造左派、操控左派、壯大左派，最終要從國民黨手中奪去革命領導權；它同時也建立在多數國民黨右派軍政領袖貪利腐化、失去理想、理論匱乏的土壤上。這恰好給了鮑羅廷和中共可乘之機。在政黨策略上，鮑羅廷扶植國民黨左派、弱化右派；在群眾基礎上，以發展工人運動為主，農民運動為輔。省港罷工正是利用反帝國主義運動來實踐目標。在中共眼中，商人是國民黨右派的群眾基礎，只有在示威遊行或是需要募捐時才有利用價值。到了廖仲愷被刺，因為國民黨左派政權出現危機，中共高唱「工商聯合」以鞏固情勢。以後幫助國民黨發展商民運動，意在把商人從國民黨右派手中爭奪過來，強化左派的群眾基礎。中山艦事件後，共產國際驚覺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在廣州的地位並不穩固，決定採取戰略性撤退，對蔣讓步。由於罷工拖得太久，使它在廣州的地位陷入險境，中共最

⁶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312.

後利用農工商學聯合會的名義來要求結束省港罷工。

學術界對省港罷工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Chesneaux 很早就對罷工組織、罷工運動以及廣州內部政治勢力的發展，提出扼要且極具視野的論述；陳明鈺又在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尤其對香港和廣州所受到的經濟影響有更深入的分析。⁷本文則討論廣州商人和國民黨右派在罷工運動中的拉力，分析他們對罷工運動的影響。我所探討的不是工人運動內部的問題，也無法涵蓋工人和商人之間的所有問題，而主要從中共對商人聯合戰線策略的演變，論述省港罷工期間政治勢力變化與廣州商人之間的關係。我相信透過這個分析，可以使省港罷工的面貌更為清晰。本文除了重新審視省港罷工對外路線變化以及廢除特許證的背後原因，也分析了運動前後期兩個以工農商學各界聯合為名的組織——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和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它們對運動的興衰極具關鍵角色。前者過去學界少予注意，後者則被誤解為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廣州四商會共同支持的組織。⁸

國民黨聯俄容共（中共說是聯共）時期，中共將國民黨劃分為左、右派，對國民黨進行聯合、分化。何為左派？何為右派？其間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和界線。⁹在省港罷工期間，所謂左派是指支持罷工運動，能與中共合作，有助於中共發展革命運動的國民黨人，以汪精衛為領袖，廖仲愷為主要的政策執行者。所謂右派則是對中共的罷工和革命路線持反對意見的國民黨人，胡漢民、伍朝樞、許崇智、吳鐵城都被歸為右派。左派、右派指涉的對象，並非固定不變，有些國民黨人的政治態度和立場也會因為某些因素而改變。中共的統一戰

⁷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pp. 308-356. 陳明鈺後來又進一步探討省港罷工的工人動員，見 Ming K. Chan, "The Realpolitik and Legacy of Labor Activism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1920s Greater Canton," in Mechthild Leutner, Roland Felber, M.L. Titarenko and A.M. Grigoriev, ed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Between Triumph and Disaster*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pp. 187-221.

⁸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315.

⁹ 參見拙作，〈左右之間：容共改組後的國民黨與廣東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1（2011 年 3 月），頁 5-6。

線和商民運動，與它對國民黨的聯合分化策略是三位一體的。本文使用左派、右派等中共當時所用的革命話語來進行論述，希望能夠更精確地闡明中共的策略，以及省港罷工期間廣州內部各股力量的複雜關係。

二、廣東各界對外協會

省港罷工由中共派員赴香港和沙面策動，已廣為人知。引起沙面槍殺事件的示威大遊行，是由一個名為「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的組織所發起，卻很少引起注意和討論。這個組織在省港罷工運動初期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它以農工商學兵各界共同組織的形態出現，即使國民黨中央也不知道它是一個中共主控的組織。用「對外協會」的名義來掩護發展勢力的行動，則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早在 1924 年 7 月，中共中央即通令黨員在各地組織「國民對外協會」，做為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總樞紐。當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號（由委員長陳獨秀、秘書毛澤東簽名發出）指出，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應作之事第五項為：

各地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面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面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此項組織，必須個人加入，加入時，必填寫入〔志〕願書，萬不可團體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數量之增多，而應注重質量之明確，當以不滿意國民黨右派主張為重要標準。此會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不可與國民黨團體混合，尤不可受國民黨支配；惟在國民黨不能公開地方，完全由我們造成國民黨黨部，可用此協會名義，對外公開；但此協會內萬不能容留右傾觀念的分子在內。¹⁰

由此可見，中共組織「國民對外協會」的目的，不但是用以建構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而且是造成國民黨左翼勢力，以與國民黨右派對抗。事實上，國民對

¹⁰ 〈中央通告第十五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編，《「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304-305。

外協會是便於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掩飾性組織。五卅以後成立的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因應局勢的變化，把必須以個人加入，調整為由團體代表所組成。

廣東各界對外協會於 1925 年 6 月 17 日以各界代表大會通過的形式成立，中共在事前經過周詳的計畫。在上海五卅慘案發生隔天，中共廣東區委決定和共青團廣州地委聯合組織一個臨時委員會，於 6 月 2 日發動群眾舉行示威巡行。臨委會聯絡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廣東全省農民協會、廣州市商民協會、廣州學生聯合會、青年軍人聯合會六個團體擔任發起。¹¹六團體中，工農兵學的五個團體都是中共掌握的組織，而廣州市商民協會是中共策劃下，由國民黨中央商民部組織的商人團體，人數不多，主要成員為國民黨黨員，當時是國民黨左派和中共用為代表商界發聲的組織。¹²中共黨員先透過學生、工人黨部和社團進行動員。6 月 2 日在廣東大學操場舉行的大會，到會者數千人，以學生占最多數，其次為工人約千餘人，軍人僅代表參加，商人尤少。大會按中共黨團原先計畫，議決組織廣東工農商學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聯合會，聲援上海因五卅慘案而展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個聯合會就是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的前身。由於當時的大元帥府決定先肅清廣州滇軍將領楊希閔和桂系將領劉震寰的軍隊，聯合會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活動暫停，但仍派二名代表赴香港宣傳，運動香港八校學生組織學聯會。¹³

討伐楊劉之役結束後，廣東中共黨團決定正式展開聲援五卅案的反帝運

¹¹ 〈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關於「五·卅」、「六·廿三」、劉、楊叛變等宣傳活動情形〉，收入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編（下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廣州：出版社不詳，1986），第 1 輯，頁 514；〈廣東工農兵商學各界為日英帝國主義者槍殺上海同胞發起示威大巡行啓事〉，《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2 日，第 2 版。

¹² 參見拙作，〈左右之間：容共改組後的國民黨與廣東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1，頁 34-35。

¹³ 〈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第十七號）——關於香港援助「滬案」和廣東各界對外協會擴大會議、地方大會情形〉，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1 輯，頁 457。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編，《廣州青年團沿革(1920-1926)》（廣州：出版社不詳，1986。按：該書封面將書名起迄時間誤印為 1921-1926。）亦收錄此條資料，但經過刪節，見該書，頁 196-197。另參見賴先聲（玉潤），〈在廣東革命洪流中——回憶 1922-1927 年的鬥爭〉，收入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下略），《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 103。

動。他們在 6 月 17 日召開廣東農工商學兵各界代表大會，與會者三百人，代表一百二十餘個團體。大會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中共黨員李森（李啓漢）擔任主席，中共黨團控制了整個會議。大會議決組織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做為聯合各界進行反帝運動的機構，並且議決運動的幾個方針，包括抵制英日美劣貨、拒絕使用外幣、實行經濟絕交、不賣田料原料糧食等物、在帝國主義者之下的工人一律罷工、舉行大規模募捐、擴大統一民眾組織、通電全國全世界、對帝國主義提出要求條件十三條等，並且決定於 6 月 23 日舉行各界示威大巡行。大會同時通過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章程，選舉對外協會執行委員。¹⁴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宣言、章程、辦法、要求條件，都是中共黨團事先擬定；組織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也是中共黨團認為原來的廣東工農商學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聯合會過於狹隘，決定將它改組，以利於反帝國主義運動擴大進行。所有這些議案，在各界代表大會都由中共黨團主導照案通過。¹⁵

中共黨團發動組織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以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的外在形式，取得運動的發動權和領導權。按照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章程規定，各界代表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執行委員會為最高執行機關。執行委員會由二十五團體組成，每個團體各派代表一名為執行委員。17 日各界代表大會選舉的二十五個團體，完全為中共黨團預定，其中以中共能控制的團體占多數。¹⁶

中共黨團對於國民黨在運動中的角色亦曾加以審慎考慮。其時中共黨團已派員前往香港和廣州沙面租界策動工人罷工，亟需國民黨中央的協助，因此一方面向國民黨要求協助，另一方面又恐怕國民黨中央以執行委員身分進入協會

¹⁴ 〈昨日各界代表之大會議〉、〈各界代表大會續紀〉，《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18 日，第 8 版；6 月 19 日，第 6 版。19 日的報導，將「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章程」誤記為「廣東各界援外協會章程」。

¹⁵ 〈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第十七號）——關於香港援助「滬案」和廣東各界對外協會擴大會議、地方大會情況〉、〈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關於「五·卅」、「六·廿三」、劉、楊叛變等宣傳活動情形〉，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1 輯，頁 457-458、517。

¹⁶ 〈各界代表大會續紀〉，《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19 日，第 6 版。〈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指出：「舉出二十五個團體代表，俱照我們原定，我們的團體占多數。」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1 輯，頁 457。《廣州青年團沿革(1920-1926)》收錄同篇文件（頁 197），但將此段文字刪除。

後，影響中共在協會的領導權，乃以政黨不宜加入協會為辭，排除國民黨中央入會。¹⁷

對外協會把商人團體納入執行委員，亦具有深意。因為如此安排，協會在形式上顯得非純由工農團體組成，可以隱蔽其為中共外圍組織的性質。商界在執行委員會中占兩席，由商民協會和廣州總商會各派一名，在協會中居於少數。而且在此兩席中，中共能夠控制商民協會。如此設計，一方面可以達到聯合商人共同反帝的目的，一方面又削弱商界在協會中的影響力，同時能以團體的力量促使商界配合運動。

廣東商人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時，就對國民黨共產化深感疑懼，商團事件又重創商人和政府的感情。楊劉之役前夕，政府還在向商人極力解釋不可能實行共產，商人疑慮未解，緊接著省港大罷工又要登場，商人內心的不安可想而知。17日各界代表大會的議決案，未要求商店罷市，僅要求商界在示威遊行日休業一天，是因為中共深知商人罷市在當時無實現可能。對外協會曾透過廣東省長胡漢民，請廣州四個商會的領袖支持罷工，¹⁸但是效果並不明顯。

6月23日由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召開的示威運動大會，參加群眾約五萬餘人，大都由中共黨團和國民黨透過組織動員而來，其中以香港和沙面罷工工人為最多。群眾所持標語、旗幟以及示威大會之決議案，無一非由中共黨團事先準備妥當。¹⁹示威大會分三個會場，中間為工農團體會場，左為學商界會場，右為軍界會場；遊行隊伍依工、農、學、商、軍順序排列，²⁰也是中共黨團事前預定，顯示工農為運動之主體。當巡行隊伍行至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英

¹⁷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239-240；〈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指出：「惟我們不許KP（國民黨）中央加入執委，以政黨為名抵制，因恐加入後，領袖地位為彼所占據也。」見《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頁458。《廣州青年團沿革(1920-1926)》收錄同篇文件（頁197），但將此段文字刪除。

¹⁸ 〈昨日省署之商人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19日，第3版。

¹⁹ 〈團廣州地委宣傳部報告——關於「五·卅」、「六·廿三」、劉、楊叛變等宣傳活動情形〉，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頁517。

²⁰ 〈今日全市民對滬案之示威巡行〉、〈東較場開會情形〉，《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3、25日，第3版。

法水兵巡捕向群眾開槍射擊，被擊斃者五十餘人，受傷者一百七十餘人，是即沙面事件，或稱沙基慘案。

沙面槍殺事件發生，對省港罷工運動帶來重要影響。當香港和沙面工人開始罷工時，距離上海五卅案發生已二十日，廣州民眾的反英情緒已有所降低。不但商人對支援罷工反應冷淡，國民黨右派對罷工亦持保守態度。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吳鐵城反對罷工，極力防範示威巡行群眾出現越軌行動；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建設廳長孫科主張罷工只能限定為三天的政治罷工。甚至一些廣州的工人領袖也認為如果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罷工不可能持久。但是，沙面槍殺刺激了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情緒，降低了右派在運動中的影響力。²¹

無論這個槍殺事件是否為中共黨團事先計及，情勢確實是往他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省港罷工初期，各界對外協會是以總機關的姿態出現，經常用各界代表大會的名義請政府配合，對群眾發號施令。廣東省長公署下令，23 日各機關團體商店一律停業一天參加巡行，自是日起下半旗，人民臂纏黑紗七天，以示對上海等地被外人慘殺的同胞哀悼，便是該會提出的要求。²²沙基案滿月之期，國民政府亦循該會之請，發出訓令請各界配合。²³對外協會議決的抵制英日等國貨物、拒絕使用外幣、經濟絕交、罷工等，以及後來通過的經濟封鎖辦法，²⁴都提交政府，成為政府進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重要內容。

不過，在反帝國主義的路線上，由中共黨團在背後主導的對外協會，和國民黨右派及廣州商人的主張則出現嚴重分歧，此在沙面事件發生後尤為明顯。中共黨團意圖藉五卅和沙面事件展開全面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對外協會以打

²¹ 《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68），頁 143；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 311;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 247-248. 不過，陳明錄說吳鐵城等人是國民黨內反共產的西山會議派，在時間上則有點錯置，因為這時西山會議派尚未形成，此時吳鐵城被歸為孫科的太子派。

²² 〈今日全市市民對滬案之示威巡行〉，《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23 日，第 3 版。

²³ 國民政府秘書處編（下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號 3（1925 年 7 月），〈訓令〉，頁 55；〈各界對外協會緊急通告〉、〈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緊急通告〉，《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30 日，第 3 版；7 月 23 日，第 2 版。

²⁴ 〈廣東各界代表大會開會情形〉，《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30 日，第 3 版。

倒一切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爲方針，該會的決議內容，如函電各省組織全國對外協會、通告各地組織分會、展開更大的示威運動、派人往各國聯絡全世界被壓迫的農工爲一致之反抗、請政府整備海陸軍準備作戰、通電全國各界一律起來準備武裝以捍衛國家、組織學生軍、工團軍、農民軍以爲外交後盾等，都是中共的主張。²⁵組織全國對外協會和對外協會各地分會，其實就是政黨組織擴張的一種方式。

國民黨右派和廣州商人對於罷工的態度，原本就和中共不同。沙基案後，因爲受愛國主義的鼓盪或驅迫，不敢違逆罷工情勢。但國民黨右派反對與所有帝國主義對抗的主張，商人更不認爲風潮擴大會帶給他們好處。沙基慘案發生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同胞注意一文，說：「我們不是排斥一切外國人，我們祇是反抗帝國主義殘殺迫害我們的外國人。」這份文告指出，俄、德、奧已取消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美、葡、荷等國雖未取消不平等條約，但與沙面慘殺事件無關，英、法爲沙面事件行兇者，英、日爲上海、漢口等處慘殺事件原動者，是應以英、法、日爲對象。²⁶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所擬定的經濟絕交十不辦法，包括不用英、法貨物、不用英、法銀行紙幣、不與英、法洋行買賣交易等，則只針對與沙基案相關的英法兩國。上項主張和辦法，也爲廣州特別市黨部遵循執行。²⁷它充分反映了國民黨右派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立場。

國民黨中央的這項主張，在沙基案後，製作標語遍貼廣州街市，打倒英、日、法，美國除外的聲音曾高漲一時，廣大救國會、廣州學生聯合會（當時掌

²⁵ 〈各團體緊急會議〉、〈對外協會請各界組織分會〉，《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5日，第6版；7月3日，第7版；〈對外協會電促國人準備武裝〉，《工人之路特號》，第31號，1925年7月25日，第3版。

²⁶ 〈國民黨之重要通告〉，《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7日，第2版；錢義璋編，《沙基痛史》（無出版時地），頁108-109。

²⁷ 1925年6月27日《廣州民國日報》第3版刊出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敬告市民〉一則，提出「對英法帝國主義者經濟絕交之十不辦法」。此十不辦法係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擬定，交廣州特別市黨部執行。見〈廿八日全市黨員爲沙面慘案開大會〉，《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9日，第3版。

握在右派的民權社手中)及教會學校倡議尤力。駁載工會工人領袖黃黨且自貼街招,倡言單獨對英。對外協會執委會議對此議題曾爭論數次,不能解決。中共黨團決定提交各界代表大會討論,以人數優勢取勝。雙方代表在大會上激烈爭論,支持中共主張的軍人、學生,痛斥廣大等代表為帝國主義者走狗,喝打之聲群起,幾至動武。最後中共黨團以人數優勢,口頭草草通過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哄然而散,並未成為正式決議。²⁸

中共黨團在會議失敗後,繼續透過兩個途徑,要求國民黨中央接受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主張。其一是透過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案擬定黨的宣傳方針,由汪起草,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向黨員發出訓令,謂:「此次對外方針,凡我黨員均應依照中央黨部之歷次宣言,努力於反對一切帝國主義。」²⁹其二是由對外協會再度召集各界代表大會,邀請外交部長胡漢民出席,以群眾力量要胡宣布外交方針,當場議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再加上兩黨共同主張的從速召集國民會議,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執行。國民黨中執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隨後都決議正式接受對外協會的主張。³⁰

商界方面,雖有代表加入對外協會為執行委員,但是對於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右派持共同立場。對外協會發生嚴重爭論後,學聯會和廣大發出單獨主張的宣言,聯合右派的廣東總工會和商界,籌謀另組第二個團體。³¹最

²⁸ 〈團廣州地委宣傳部特別報告(第六號)——宣傳活動情況,各派對反帝國主義對象問題的分歧〉,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頁470-472;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中共惠州市委黨史辦、中共龍川縣委黨史辦編(下略),《黃居仁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頁44-46;〈單獨對英〉、〈對外協會代表大會情形〉,《工人之路特號》,1925年7月2日,第4版;7月3日,第3版。

²⁹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141-142。

³⁰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147;〈各界對外協會昨日之會議〉、〈對外協會請黨部及政府執行議決案〉,《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13、17日,第6版;7月21日,第3版。

³¹ 〈團廣州地委學生部報告〉,收入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編(下略),《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1923-1927)》(無出版時地),頁44-46;〈團廣州地委學生部報告(第十五號)——關於反帝運動中的廣東學生狀況與我們的活動〉,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頁485-486。

初以商學聯合會的名義召開，其後定名廣大救國同盟會。廣州總商會等商界團體派出代表參加，該會舉出七名委員，商界即有總商會副會長胡頌堂等四人當選。³²該會共召開兩次會議，中共黨團事先偵悉其開會計畫，派出代表參加，並以對外協會名義，對商界代表力行勸導。商界代表不願公然與對外協會決裂，該會無結果而散。³³

對外協會發生嚴重爭論後，中共黨團雖然仍能控制該會，但是商界意在敷衍，國民黨右派則採取消極抵制態度。報界公會、廣東總工會、駁載工會、海員工會等團體，不派代表出席執行委員會。而該會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於要處理罷工事宜，無暇兼顧，決定辭職。中共黨團雖改推廣州工人代表會為主席（代表為廖仲愷），但該會聯合各界一致對外的作用漸失。³⁴到了7月下旬，該會召集的各界代表大會，由於出席人數不多，對於重大問題，往往無法形成決議。³⁵其時，廣東省政府籌組經濟獨立委員會，亦由農工商學等團體代表共同組織，頗有取代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之意。³⁶中共黨團有感於對外協會功能漸失，必須改弦更張，曾籌劃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廣東省政府共同組織廣東人民代表大會，³⁷其後為譚平山提議的統一廣東各界代表會取代，³⁸廣東各界對外協會逐漸消散。

³² 〈商學兩界聯合對外之會議〉、〈對外協會第十二次常會議案〉，《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9、17日，第6版。

³³ 〈團廣州地委學生部報告〉，收入《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1923-1927)》，頁44-46；〈對外協會第十二次常會議案〉、〈各界對外協會第十三次會議紀〉，《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17日，第6版；7月20日，第3版。

³⁴ 〈團廣州地委宣傳部特別報告（第六號）——宣傳活動情況，各派對反帝國主義對象問題的分歧〉，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頁471-472；《黃居仁研究史料》，頁45-46；〈對外協會第十八次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31日，第3版。

³⁵ 〈對外協會十七次常會議案〉，《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29日，第6版。

³⁶ 1925年7月下旬，廣東省政府籌組經濟獨立委員會，農工廳長陳公博在省務會議中提議，對外協會不宜加入，因兩會皆為各團體組織，對外協會再加入則為駢枝。不過，其所提意見，會議決議撤銷，顯然是廖仲愷提出了不同的主張。見王美嘉編，《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7），頁19；23-24。

³⁷ 〈對外協會十七次常會議案〉、〈廣東人民代表大會之組織規程〉，《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29日，第6版；8月1日，第3版。

³⁸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164-165。

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在省港罷工初期曾發揮領導運動的作用，但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組織工農學軍等訴求，調子唱得太高，把國民黨右派和商人嚇跑了，終至無法達到聯合各界一致對外的目的。省港罷工後來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採取「凡不是英貨英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的單獨對英策略，當時擔任省港罷工委員會顧問、對罷工策略極具主導地位的鄧中夏，在事後指出：「這一政策，其妙用不可勝言。」³⁹觀諸罷工前期所發生的爭論，似乎略帶幾分諷刺意味。

三、罷工與特許貨物運輸

省港罷工由中共方面策劃發動，國民黨中央和革命政府則予以配合支援。廣東農工商學兵各界代表大會決議的示威遊行和經濟絕交等辦法，獲得革命政府的認可而得以實現；罷工運動亦獲得革命政府的協助而得以維持許久。做為罷工總機關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因為有國民政府的全力支援，而有極大的揮灑空間。

這和 7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國民政府的權力佈局顯然有密切的關係。國民黨顧問鮑羅廷扶持左派的汪精衛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廖仲愷擔任財政部長，對共產黨較有意見的大本營代理大元帥胡漢民改任外交部長，胡的廣東省長職位亦為許崇智所取代。⁴⁰黨政中央權力結構調整後，國民黨中央政策方針的變化，首先反映在前節所述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態度轉變。這個權力調整，對省港罷工的展開，顯然極為關鍵。領導罷工的總機關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國民政府成立後兩天正式成立。這個委員會是完全由中共控制的組織，委員長是曾經領導香港海員罷工的中共黨員蘇兆徵。⁴¹它是罷工的最高執行機關，執行最高議

³⁹ 鄧中夏，〈一年來省港罷工的經過〉，《鄧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295。

⁴⁰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頁 374-375。

⁴¹ 蘇兆徵於 1925 年 3 月代表香港的工會團體，到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會議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見盧權、襍借紅，《蘇兆徵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 62、172。

事機關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其下有幹事局，分部辦事，又設財政委員會、法制局、審計局、糾察隊、會審處、拘留所、保管拍賣局、工人醫院、築路委員會等，組織相當完備，儼然為工人政府的雛形。⁴²國民政府將東園撥借為它的辦事處，裡面有三棟三層樓房舍和可供訓練糾察隊之用的廣場。⁴³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封閉廣州各賭館、烟館、空屋，做為罷工工人的飯堂、宿舍。⁴⁴

國民政府也依照罷工委員會的要求，下令廣東沿海所有口岸禁止糧食出口，並且認可省港罷工委員會發出通告，自7月10日起所有來往香港新界的輪船渡船一律停擺。⁴⁵海口封鎖由罷工委員會成立的糾察隊執行。這個糾察隊有二千多人，以總隊、大隊、支隊、小隊、班的組織形態編成，由黃埔學生加以軍事訓練，對進出人員、貨物有檢查的權力。⁴⁶罷工委員會的行動和權力，隨著國民政府控制的範圍擴大，1926年春它可以控制北海到汕頭的海岸。⁴⁷

糾察隊有權拘捕違反罷工禁令者，由罷工委員會下設的會審處加以審訊。罷工委員會要求設立特別刑事審判所，嚴懲破壞罷工者，得到國民政府准許。⁴⁸國民政府對罷工委員會幾乎有求必應，讓罷工委員會擁有形同政府的組織、軍隊和權力，以致當時人們普遍稱之為「第二政府」或「東園政府」。⁴⁹

國民政府除了給予罷工委員會上述的支持和權力，經濟上的援助更是罷工得以持續的關鍵因素。省港罷工展開後，廣州的罷工工人有二十餘萬人，維持

⁴² 鄧中夏，〈省港罷工勝利的原因〉，收入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下略），《省港大罷工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747-748。

⁴³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p. 293-294.

⁴⁴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廣州：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宣傳部，1926），頁7。

⁴⁵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3（1925年7月），〈訓令〉，頁32；〈斷絕省港交通之通告〉，《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8日，第6版。

⁴⁶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7-8。

⁴⁷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294.

⁴⁸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13-14；《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3（1925年7月），〈指令〉，頁83-84。1925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特別刑事審判所，規定在罷工期內，應由罷工委員會派三人陪審，其職權以關於罷工案件為限。《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15（1925年11月），〈令〉，頁12-13；號16（1925年11月），〈法規〉，頁5-8。

⁴⁹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293. 盧權、襪倩紅，〈蘇兆徵傳〉，頁84。

他們的生活需要可觀的經費。國民政府運用行政權，飭令廣州市公安局將所徵收的半月租捐撥交罷工委員會，要求各華商煙公司捐款幫助罷工。並且和罷工委員會議定，將罷工工人投入開築東山黃埔公路和黃埔商港。⁵⁰至 1926 年 6 月為止，罷工委員會收到的經費共計四百九十萬元，其中來自國民政府最多，計二百八十萬元，佔總數的一半以上。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每天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⁵¹鄧中夏在事後曾說：「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⁵²這句話透露國民黨中央對罷工的支援，在私底下是有過承諾的。

人們將罷工委員會稱為「第二政府」或「東園政府」，並非讚賞，而是對其權力過大的譏刺。商人對於罷工委員會享有檢查貨物的權力，自然不具好感。汪精衛極力闡明這次罷工是針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罷工，而非工人對資本家的經濟罷工。⁵³但是，對商人來說，這並沒有什麼不同。商人不支持罷工的態度，在捐款援助罷工上明顯地反應出來。胡漢民請商界領袖援助罷工是在 6 月 18 日，直到 7 月 20 日，四商會才在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的催促下，成立廣東商界援助罷工募捐委員會，辦理募捐事宜，而且到 7 月 28 日才開始募捐。其時距離省港罷工展開已一個多月。商界募捐委員會由對外協會和四商會各派代表組織，按照各商店所領商業牌照，分級收取定額，募捐時還有警察協助進行，並且在不願捐款者店門首張貼「不願援助」字樣。⁵⁴這個辦法形同半強迫的攤

⁵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 3（1925 年 7 月），〈訓令〉，頁 32-33。

⁵¹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 240。鄧中夏說：「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是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鮑羅廷則說：「宋子文每天早晨都滿意地發給罷工工人一萬元。」〈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下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上冊，頁 145。鮑羅廷說「每天早晨」，時間的敘述相當明確。如果按照鄧的敘述，每月一萬元並不足以維持工人的生活。鄧的敘述很可能是出版時手民將「每日」誤植為「每月」。陳明錄則說，廖仲愷每天發給罷工委員會一千元。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 317. 這裡根據鮑羅廷的敘述。

⁵²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 240。

⁵³ 〈國民政府招待新聞記者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7 月 13 日，第 3 版。

⁵⁴ 〈對外協會邀請四商會開會〉、〈對外協會十五次常會議案〉、〈商界捐款援助工人辦法〉、〈飭警協助商界募捐之省令〉，《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7 月 20、25、27 日，第 6 版；8

派徵收。不過，到 8 月 25 日廣東省政府下令委員會將捐款撥交罷工委員會時，總計募得款項僅一萬九千餘元，扣除各項雜支後，交給罷工委員會的捐款只有一萬元。⁵⁵

商人對國民政府實施經濟絕交、抵制貨物無力反抗，但是希望能減少損失。他們組織了廣東商界對外經濟絕交會，議定外貨處理當從杜絕來源入手，以前購存之貨，應任其沽清，事前訂購而未運到者，持定單到會聽候處理。⁵⁶他們也希望在檢查貨物上享有主導權，不能任憑罷工委員會處理。⁵⁷

罷工和經濟絕交原屬消極手段，而且廣東經濟向來相當依賴香港，在對英經濟絕交以及英方對廣州展開報復性封鎖後，廣州如果不能在經濟上別圖新策，必然立即陷入困境。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陳公博倡議應從事積極的經濟絕交，速行建設，使廣東經濟能夠擺脫對香港的依附，走向獨立。⁵⁸「經濟獨立」成爲省港罷工期間國民政府最重要的口號，以後國民政府展開建設黃埔路、開築黃埔港等工程，都是爲了實踐廣東的「經濟獨立」。不過，這些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香港對廣州經濟封鎖後，廣州市面萬物齊漲，商業因商品來源斷絕，約十之九五以上陷於停滯，解決民生物資的供應問題刻不容緩。⁵⁹擺脫香港掣肘，走向「經濟獨立」，顯然必須從民生問題著手。

事實上，在罷工和經濟絕交展開不久，廣州商人便籲請政府正視民生物價問題。以糧食而言，最大宗者爲米。廣州日常用米向來仰給於長江流域各省和

月 7 日，第 7 版；〈商界募捐援助工友之進行〉，《工人之路特號》，第 31 號，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2-3 版。

⁵⁵ 〈商界捐款協濟工人之呈報〉，《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10 版。鄧中夏指出，罷工開始時，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廖仲愷請商人捐助罷工經費，商人只捐數千元。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 236-237。

⁵⁶ 〈商人組織對外經濟絕交會〉、〈四商會討論處置積存英日貨物之會議〉、〈總商會通告成立對外經濟絕交會〉，《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30 日，第 3 版；7 月 1 日，第 6 版；7 月 3 日，第 7 版。

⁵⁷ 〈關於檢查劣貨之公安局佈告〉、〈經濟絕交會討論查貨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7 月 14 日，第 6-7 版；8 月 1 日，第 5 版。

⁵⁸ 陳公博，〈經濟絕交〉，《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6 月 29 日，第 2 版。

⁵⁹ 〈一年來廣州商業之概觀〉，《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2 月 6 日，第 10 版。

南洋一帶，而以香港為總轉運之門戶。香港進行經濟封鎖後，米的來源受阻，廣州市民爭相購儲，部份米商從中居奇，導致米價飛漲。廣東精武體育會結合各社團和米商組織了廣東糧食維持會，籌議在香港之外，另闢米糧進口通道，向當時仍任省長的胡漢民請求允准保護。⁶⁰糧食維持會舉魏邦平為正會長，簡琴石、李明德為副會長。⁶¹魏是粵軍將領，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時，魏任第三師師長；孫中山就任廣州非常大總統，魏任廣州衛戍司令；陳炯明離開廣州後，魏與其他粵系軍官都奉許崇智為領袖。⁶²簡琴石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經理，糧食維持會開辦費用由其公司先行墊出。⁶³魏是廣東精武體育會的發起人及理事之一，簡在該會成立時任幹事長。此外，精武體育會會董盧興原對糧食維持會的成立亦居於關鍵地位。⁶⁴盧是總檢察廳檢察長，在省港罷工展開後，對於罷工委員會和工會擅自拘捕破壞罷工者，予以審訊處罰，曾表達國家刑罰執行權旁落之憂慮，呈請國民政府加以制止，防範工人發生過激舉動。⁶⁵由精武體育會發起組織的廣東糧食維持會，可以說是右派與米商聯合的組織（簡琴石後來轉信服共產主義），他們籌議國外自安南、暹羅運米來粵，不經香港，國內則由鎮江、蕪湖等產米區輸入。由於米糧供應關繫民生甚鉅，而且對罷工運動和經濟絕交能否成功有決定性影響，不但廣東省長胡漢民接納其議，派艦保護運商，罷工委員會亦令糾察隊對運糧船隻保護放行。⁶⁶這一年廣東稻米產量恰為十年來最盛者，⁶⁷產米的東西北三江，原本因為軍隊或盜匪勒收水路保護費，

⁶⁰ 〈各社團組織糧食維持會〉、〈當局維持民食之籌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9、30日，第7版。

⁶¹ 〈各界維持糧食之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1日，第7版。

⁶²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15。

⁶³ 〈廣東糧食維持會第一次會議〉、〈廣東糧食維持會董事大會紀〉，《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2日，第3版；6日，第6版。

⁶⁴ 鄭震球，〈精武體育會和它在廣州的實況〉，《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7輯，網路版。

⁶⁵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3（1925年7月），〈指令〉，頁83-84。

⁶⁶ 〈保護華僑運米來粵〉、〈糧食會維持糧食之進行〉，《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8日，第6版；7月11日，第3版。

⁶⁷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 335.

導致運商裹足。魏邦平憑藉其軍界地位，向各軍疏通，復請省政府飭令各軍撤除勒收保護費之機關，切實保護運商，東西北三江的米得以源源不絕地輸入廣州。⁶⁸除了廣關米糧來源，廣東省政府也嚴禁糧食出口。⁶⁹在政府和地方社團、商人合作下，廣東的糧食供應完全擺脫對香港的依賴。

米糧供應不過是經濟封鎖下面臨的問題之一，其他民生物資方面的需求亦立即浮現，各行業商人也很快便要求恢復商務活動，以維持起碼的生活。廣東省政府因而設立了商務廳，做為處理商務和經濟問題的專門機構，由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兼署廳長。⁷⁰宋一方面要替廣東經濟打開活路，適度滿足商人對商務活動的要求，一方面又要顧及罷工運動的進行，以及對英國經濟絕交政策的實施，因此和罷工委員會及廣州商人協調出一套辦法，即採取特許方式允許商品物資輸出入。

根據宋子文的說法，特許運輸的要求最早是由煤商提出來的，以後各商要求比照辦理。⁷¹煤炭為民生交通實業所必需，廣州每日用量約千餘噸，向來靠外洋供給。香港對廣州實施封鎖後，洋煤來源受阻，價格飛漲。宋子文一方面鼓勵煤商赴產煤的北江開採煤礦，由粵漢鐵路輸運廣州，以土煤接濟市面；一方面應煤商之要求，特許煤商雇輪赴外洋採購洋煤，由政府加以保護。⁷²此外，占燃料大宗的火油（煤油），商務廳原准許火油商領照販賣，後因美孚火油公司抗繳印花稅，商務廳乃設局專賣，委由蘇聯煤油公司代理。商人取得商務廳核發之特許證，准予販賣火油。⁷³

⁶⁸ 〈魏邦平讜請各軍官〉、〈各江米石源源運到之喜訊〉、〈軍事部函復保護龍門穀船〉，《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6日，第6版；7月14日，第7版；8月8日，第6版。

⁶⁹ 〈禁止運米出洋〉、〈嚴令各屬軍警禁米出口〉，《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1日，第7版；7月7日，第3版。

⁷⁰ 〈廣東省政府商務廳組織法〉，收入江蘇省商業廳、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下略），《中華民國商業檔案資料匯編》（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1），卷1（1912-1928），頁17-19；《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3（1925年7月），〈法規〉，頁9-11。

⁷¹ 〈宋子文關於特許證之談話〉，《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15日，第3版。

⁷² 〈廣東商務廳籌議商務行政計劃書〉，收入《中華民國商業檔案資料匯編》，卷1（1912-1928），頁20；〈本市燃料最近情況〉，《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23日，第7版。

⁷³ 〈蘇維埃商務艦隊公司廣告〉、〈商務廳設煤油專賣局〉、〈暫准商人代理專賣煤油類〉，《廣

煤商之外，絲商亦向商務廳請求特許輸出。土絲向來是廣東出口的主要產品，每年交易額有數千萬元，對外貿易斷絕，不但絲商嚴重受損，廣東經濟亦受影響。絲商提出特許出口之要求後，商務廳向中央政府力陳商家困難情形，並且取得罷工委員會同意，即請絲商公議辦法，由商務廳擬訂特許土絲輸出條例，呈請中央政府核準備案，飭令各機關團體保護，不得留難。⁷⁴商務廳並且代為接洽招商局及德、俄等國商輪，由廣州直接運滬銷售。⁷⁵其餘如荔枝乾、香蕉、香椽、藥材等，商務廳亦發給特許證，准許商人運送至上海、寧波、暹羅等地販售。⁷⁶

省港罷工展開後，廣州能夠突破香港和英國的經濟封鎖，廣東省政府商務廳實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採取特許方式，使廣東經濟活動不致陷於停滯之外，開闢新的航路，也是極為重要的措置。宋子文在商務廳設立貿易股，向蘇俄和輪船招商局租定輪船運送貨物，專門往來天津、上海、廣州等處；開闢暹羅、安南與廣州間的航線，又允許日、美等國輪船，直接運送貨物到廣州。⁷⁷這些航線，尤其是滬粵之間的航線打通後，使廣州經濟可以擺脫香港的掣肘。此外，在金融方面，廣東商民向來大都習慣用香港紙幣，沙基案發後，商民群起抵制香港紙幣，宋子文一方面備足中央銀行準備金，建立信用，一方面在各埠設立分行，擴張營業，廣東商民逐漸以中央銀行紙幣取代香港紙幣，廣東遂逐漸脫離香港的金融箝制。⁷⁸

廣東省政府商務廳採取特許貨物輸出入的辦法，並且開闢香港之外的航路，確實是廣東得以突破英國經濟封鎖的重要手段。此一措施主要的動力，顯

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3日，第1版；8月8日，第6版；8月17日，第7版；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 335.

⁷⁴ 〈商務廳核准土絲出口〉，《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10日，第3版。

⁷⁵ 〈廣東商務廳籌議商務行政計劃書〉，收入《中華民國商業檔案資料匯編》，卷1(1912-1928)，頁20-21；〈粵省生絲出口之鉅額〉，《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29日，第7版。

⁷⁶ 〈核准大幫貨物輸運出口〉，《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8日，第8版。

⁷⁷ 〈商務廳維持津滬粵交通〉、〈國民政府籌建偉大貨倉〉，《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28日、8月10日，第3版；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11-12。

⁷⁸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人部，〈反帝國主義的新策略〉，收入《省港大罷工資料》，頁684。

然來自廣州商人對商務活動的強烈要求，以及現實的民生物資問題，罷工委員會則爲了使罷工能夠持續進行，不得不對商人讓步。鄧中夏曾明白指出，愛國空氣高漲時，商人對停止貿易尚能隱忍，一旦熱潮稍褪，便要求有生意可做，另闢航路是要滿足商人做生意的要求，但若不加以限制，罷工勢必受到影響。一方面要「體恤商艱」，一方面要「保障罷工」，因此產生特許證辦法。⁷⁹這便清楚地說明，特許證是罷工委員會對商人妥協下的產物。不過，商人的要求顯然不止於此，工商兩界很快地便在特許證問題上發生重大的爭議，而罷工委員會再次讓步，改採「單獨對英」策略，不但使省港罷工得以持續，同時也促成廣東「經濟獨立」的實現。

四、特許證爭議與工商聯合

廣東省政府商務廳發放特許證，准許商人進出貨物，使廣州得以突破香港的經濟封鎖。由於各行各業商人紛紛要求領取特許證，比照辦理，商務廳決定訂定詳細辦法以利施行。

7月底，商務廳訂定了特許證暫行規則，規定商人請發特許證，應繳手續費五元及印花費二元。請領時應載明貨物出產地、種類、重量、起運及起卸時地等。特許運輸之貨物，限於核准者，須繳納稅餉捐款。⁸⁰貨物應否發給特許證，由中央及省政府財政、商務及外交部門合組的審查會進行審查，通過後由商務廳會同公安局長和省港罷工委員會代表簽字，最後由外交部長署名發出。⁸¹

特許證規則訂定後，因爲商人不滿，一度使工人和商人的關係陷於緊張。商人以特許證之設，本爲限制仇國貨物輸運，但按照新規則，連內地貨物亦併同實施，而且手續過於繁複，又須繳交手續費、印花費，因而群起反對。廣州

⁷⁹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 18-19；〈罷工委員會之議決案〉，《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31日，第6版。

⁸⁰ 〈商務廳之特許證暫行規則〉，《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7月31日，第5版。

⁸¹ 〈商務廳檢查特許證之縝密〉、〈廣東經濟獨立之進行〉，《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12日，第6版；8月13日，第3版。

總商會等四商會召集聯席會議，議請商務廳將原案撤銷，並且派代表赴商務廳向宋子文請願。宋在商會領袖的強烈要求下，表示將原案撤銷恐難辦到，願意將辦法修改更爲簡易：改照報關單程式請領，免除手續費，貨價一萬元以下者貼印花一元，一萬元以上者貼印花五元。⁸²

宋與四商會代表會議的時間是 8 月 10 日，13 日即由商務廳將上項辦法公布施行。他和商會代表還初步議定：所有省內各地輸運貨物一律免領特許證；仇國貨物除英貨不准運輸出入，法、日兩國貨物確有需要者，准發特許證輸運。⁸³罷工委員會在 14 日明白宣示：允許非英國貨品、非英國船隻運載，及非自香港運來者，一律發給特許證。⁸⁴這項辦法的改變，顯然就是對商會以及商務廳的回應，它也預示罷工運動開始轉向「單獨對英」。但是，商人對這項辦法仍不滿足，他們認爲特許證對貨物運輸造成各種不便，使商人蒙受損失，應行撤銷。以魏邦平爲首的糧食維持會致函商務廳說：

在貴廳成立伊始，謂宜乘此時機，勵行保育政策，對於糧食運商，有獎進而無制限，方可免為仇我者所困。今於載米入口船隻，乃有領發特許證之規定。此舉是否手續繁重，是否時日稽延、船隻誤期，是否受補償之損失，姑弗具論。所最可注意者，領發特許證辦法，能令省內外運商一致諒解與否之問題。因各商倘認爲難行，則糧食之運輸，當然減少。……在於此時，何苦以一證書，使來源為之頓窒？復據說行商（米商）等來會報告，謂領證手續有費，貼用印花亦有費。似此直接則增加糧食成本，間接則抬高糧食市價，尤非注重民生之道。⁸⁵

魏邦平的言論，不僅反應米商的意見，也是多數商人的心聲。爲了表示商界對撤銷特許證的堅定立場，四商會領袖共同決定，若目的未能實現，即辭去會長

⁸² 〈四商會請撤特許證之近訊〉、〈廣東商務廳佈告〉，《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

⁸³ 〈四商會請撤特許證之近訊〉，《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

⁸⁴ 〈省港罷工委員會重要宣言〉，《工人之路特號》，第 51 期，1925 年 8 月 14 日，第 1 版；〈省港罷工委員會關於設立特許證的通告〉，收入《省港大罷工資料》，頁 288。

⁸⁵ 〈糧食會對特許證之意見〉，《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8 月 17 日，第 6 版。

職務。⁸⁶

17日，工商兩界代表再就撤銷特許證問題開會討論，商界代表認為特許證徒具形式，並無實效，力主撤除；工界代表鄧中夏、蘇兆徵不願面對商界的強烈要求，放低姿態表示可再磋商改善辦法，並言：

我們工人是願意與商界同胞合作的，尤其在此反對帝國主義中間，應該聯合農工商學一致奮鬥，切不可工商自分界限，分裂我們救國大團體。⁸⁷

鄧、蘇的言辭，不過是希望化解商人的對立情緒。次日召開的工人代表會，仍然一致主張保留特許證，並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致函四商會，表達工界立場。信上雖然高喊「工商攜手」，但卻明白表示此次罷工，非為工人本身爭利益，純係民族解放，為國家爭主權之政治罷工。罷工工人對商界同胞已經一再讓步，若並此最低限制之特許證猶須根本撤銷，將使罷工毫無保障。⁸⁸

正當工商兩界對應否撤銷特許證僵持不下之際，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突然做出撤銷特許證的決議，並由臨時代理主席汪精衛具名函告罷工委員會。罷工委員會隨即召開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討論，決議尊重政治委員會之意，撤銷特許證。政治委員會的信函並未敘明撤銷特許證的原因，僅言：「現在情勢已有變更，似無發給特許證之必要。」⁸⁹所謂「情勢已有變更」，指的是8月20日廖仲愷被刺，導致政情丕變。

廖仲愷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農民部長，不但掌握財權，又為推展農工運動、支持罷工最力之人，向來

⁸⁶ 《省港大罷工資料》，頁835。

⁸⁷ 〈工商兩界討論特許證之大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18日，第10版；〈商會討論取消特許證〉，《工人之路特號》，第51期，1925年8月18日，第1-2版。

⁸⁸ 〈省港罷工委員會致四商會函〉，《工人之路特號》，第56期，1925年8月19日，第1-3版；〈省港罷工委員會為特許證事致四商會函〉，收入《省港大罷工資料》，頁290-293。

⁸⁹ 〈撤銷特許證〉，《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8月28日，第3版。鄧中夏說，廖案發生後數日，罷工委員會「自動取消特許證」，與實情不符。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19。

被視為國民黨內較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健將。廖之死，是國民黨右派勢力強烈不滿左派受共產黨操縱、贊助罷工，而採取的暗殺行動。⁹⁰事實上，商人對撤銷特許證的堅持，正是以國民黨右派為後盾。當時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是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他同時也是國民政府軍事部長和廣東軍事廳長，所部魏邦平、梁鴻楷等粵系軍官對罷工委員會形同「第二政府」，早已深致不滿，對罷工損害其利益更為痛恨。魏邦平以糧食維持會會長身分，對特許證規則提出強烈抨擊，正是國民黨右派結合商人反對左派罷工路線的政治行動。

自省港罷工展開以後，香港殖民地政權即透過各種途徑來破壞罷工，並圖謀結合廣東境內的反對勢力，推倒國民政府，一方面以經費和軍械援助東江的陳炯明和西江的鄧本殷，一方面透過香港華商聯合廣東商界力量，對廣州政府施壓。⁹¹此外，又積極聯絡國民黨右派的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負責對外交涉事務的兩廣交涉使兼海關監督傅秉常等人，圖謀儘早結束罷工。⁹²工商兩界因為特許證發生重大爭議時，傳言國民黨右派欲發動政變，中共黨團決定先採取行動對右派示威，由廣東各界對外協會聯合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團體，於 8 月 11 日召開了一個超過五萬人的大會。會上通過「肅清廣東境內一切反動勢力，驅除一切賣國分子」，「我們應聯合起來，反對人民之公敵及帝國主義之工具」。這個大會以「統一全省運動大會」為名，會後舉行遊行示威請願，⁹³其真正目的是「壯國民黨左派之膽」，促其對右派「實行斷然處置」，但左派並未採取行動。⁹⁴廖仲愷被刺，便是在廣州內部這種左右派嚴重對峙的局面下發生的。

⁹⁰ 陳公博，《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頁 37-43。

⁹¹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p. 343-344.

⁹²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 10、16；盧權、禰倩紅，《省港大罷工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頁 219-225、232。沙基慘案發生後，傅秉常實際負責廣州對各國的交涉，見沈雲龍訪問，謝文孫紀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58。

⁹³ 〈統一全省運動之大巡行與請願〉，《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

⁹⁴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 234；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 15-17。

廖案發生後，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緊急撤銷特許證，是爲了防止廖案的政治效應擴大，希望削弱商民反抗政府的心理。國民黨中央接下來又採取一連串手段，以鞏固社會秩序，挽救商民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逐漸喪失的信任。案發當日，國民黨中央接受鮑羅廷的建議，迅即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予政治、軍事及警察全權。⁹⁵蔣於 24 日就廣州衛戍司令職，次日即逮捕兇嫌林直勉等人，隨後又以與香港政府密謀顛覆國民政府的罪名，解散粵軍將領梁鴻楷等部隊。⁹⁶這些迅速的軍事行動，無疑地向商民宣示政府有控制局面的決心和能力。

廖仲愷被刺，原因雖然複雜，但是「共產與反共產之爭」確係其一。不過，國民黨中央爲了防止商人恐共的心理滋長蔓延，不利於政權，極力淡化此一因素。特別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宣傳部、中央商民部接連發出的佈告，都強調廖爲帝國主義走狗的反革命派暗殺，它是「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戰，而非共產與反共產之爭。」⁹⁷

爲了徹底釋除商民心理上的不安，特別委員會復於 9 月 3 日，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聯合宴請廣州商界重要人物，當面向他們保證政府絕無實施共產之可能，並聆聽商界人士對政局的意見。這是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宴會。商界到會者有總商會胡頌棠、市商會李朗如、商聯會余厚菴、商民協會蔣壽石、輪船商會殷質文等三百餘人。政界除汪、許、蔣三人外，俄國顧問鮑羅廷、財政部長鄧澤如、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廣州市政府商務廳長宋子文等共二十餘人與會。汪、許、蔣分別發表演說。汪特別說明國民政府政策，以軍政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軍需獨立爲目標，此四者不特非共產，且無一不對商民有利。實行罷工以對抗香港政府，亦爲求廣東獨立自存，與共產無關。

⁹⁵ 特別委員會的設置，以及任汪、許、蔣三人爲特別委員，皆係鮑羅廷所提議。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頁 340。

⁹⁶ 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線裝本，1937），冊 11，頁 65-68；冊 12，頁 22。

⁹⁷ 〈特別委員會闢謠佈告〉、〈中國國民黨告同志及民眾書〉、〈中央宣傳部哀告市民〉、〈中央商民部哀告全國商民〉，《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8 月 28 日，第 2 版；9 月 1 日，第 2-3 版；9 月 3 日，第 3 版。

汪強調政府扶助農工，乃為全民革命而非共產。商人和農工同受帝國主義經濟之壓迫，應與農工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⁹⁸

宴會刻意安排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對商界領袖演說。這是鮑羅廷首度與廣州商界領袖正式會面，由伍朝樞即席翻譯其演說辭。鮑羅廷力言，中國目前產業落後，政治紛亂，並不適於共產；俄國幫助國民政府，純為扶助中國走向獨立自由，脫離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廣東現時應由人民建立廉潔的政府，但是商人、農人、工人、學生和軍人都無法單獨成功，惟有聯合起來，方能完成目的。⁹⁹鮑羅廷在當時正全力藉國民黨發展中國共產勢力，所謂共產不適於中國的說法，不過是安撫商民的飾辭。

這次宴會對國民政府與廣州商界關係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義。商界領袖從黨政領袖口中直接獲得政府非實行共產的保證；並且即席反映印花稅辦理不善，對商民造成苛擾，以及煤油專賣定價太過昂貴，影響小民生活等意見。¹⁰⁰同時得到政府將全力改革財政，商人可以組織研究會來協助政府的承諾。¹⁰¹

9月3日宴會，是鮑羅廷和中共在背後策劃，具有扭轉情勢的深刻用意。自罷工運動展開後，國民黨右派和廣州商人不斷地對國民黨中央的罷工和封鎖策略提出異議，認為政府的政策完全受到共產分子的影響。廖案發生，共產黨內部認為是打擊共產黨的開端，對廣東政局安危構成嚴重影響，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化解危機。共產黨一方面向國民黨左派獻策迅速剪除右派勢力，¹⁰²一方

⁹⁸ 〈特別政治委員會宴會廣州商界詳情〉、〈特別委員會宴會商界之重要演說——汪精衛先生演說詞〉，《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4日，第2版；9月5日，第3版；9月7日，第10版。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任命古應芬為財政部長。古於9月3日辭職獲准，由鄧澤如接任財政部長。鄧澤如於9月22日辭去財政部長，由宋子文接任。

⁹⁹ 〈特別委員會宴會商界之重要演說詞——鮑羅廷先生之演說詞〉，《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12、14日，第7版。

¹⁰⁰ 〈三日公宴商界席上之討論〉，《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5日，第3版。

¹⁰¹ 〈特別委員會宴會商界之重要演說詞——許汝為先生演說詞〉，《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10日，第7版。廖仲愷被刺後，國民政府以整頓財政與整頓軍政息息相關，授軍事部長許崇智監督廣東境內中央及地方財政全權。〈國民政府統一財政之決心〉、〈政府委許崇智監督財政〉，《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3、7日，第3版。

¹⁰² 賴先聲（玉潤），〈在廣東大革命的洪流中〉，收入中共廣州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州大革命時期回憶錄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50-52。

面則盡力拉攏商人。鮑羅廷和汪精衛等人對商人釋出善意，與政府及工界決議撤銷特許證一樣，都出於中共對商人的戰略性讓步。其目的是把商人從國民黨右派陣營拉到左派，並且防阻商人與香港政府聯合破壞罷工。

在同意撤銷特許證之後，罷工委員會立即和四商會訂定善後條例，聲明除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澳門者外，所有船隻、貨物均得自由往來貿易，開倉起卸。¹⁰³這個善後條例進一步確立罷工運動的「單獨對英」政策，它也成為此後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鄧中夏在事後說，特許證是罷工委員會自動取消，¹⁰⁴又多次讚揚罷工委員會改採「單獨對英」策略極為正確，不但拆散英、美、日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達到孤立英國的目的，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是省港罷工能夠持久的一個重要原因。¹⁰⁵事實上，從廣州內部的情勢來看，商人和國民黨右派採取強烈的對抗行動，是迫使罷工委員會轉變策略的關鍵因素。

善後條例訂定後，中共黨團為了進一步化解工商之間的緊張關係，又於9月14日晚以省港罷工委員會名義，設筵歡宴商界領袖。當場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四商會達成工商聯合決議，決定工商聯合起來，共同實現十項目標：(1)擁護國民政府；(2)減少軍額；(3)實行廢除苛捐雜稅；(4)肅清土匪，實現和平；(5)使罷工勝利後，工商業能夠振興；(6)完成粵漢路；(7)非但完成黃埔公路，並促成黃埔商埠，及其他公路；(8)務使罷工勝利，一年之內，廣東出入口貨，增加一倍；(9)工商聯合起來，成一個最大的力量；(10)務使廣州變成一個富庶的、繁華的都市。會議通過將此十項目標，印就十種標語張貼於各街衢，通告市民。¹⁰⁶

¹⁰³ 〈取消特許證後之善後條例〉，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卅運動和省港罷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296-298。

¹⁰⁴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19；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237。

¹⁰⁵ 鄧中夏，《省港罷工概觀》，頁11-12；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235-236；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p. 321-325.

¹⁰⁶ 〈罷工會歡宴商界領袖〉、〈今日各界聯合之示威巡行〉，《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16日，第7版；24日，第3版。當晚到會之商界領袖，有市商會楊公衛、譚棟池，總商會胡頌堂、

工商聯合，既是共產黨為化解危機而採取的策略性手段，受共產黨左右的國民黨中央，隨即發表宣言，表示完全接受工商聯合決議，並訓令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以決心實力擁護，促其實現。¹⁰⁷為了加強工商聯合的形勢，國民黨中央黨部又於9月24日舉辦軍政學農工商各界大會及示威大巡行；10月2日中秋夜，舉行各界共祝昇平之提燈大會。兩次大會表面上以國民黨中央黨部名義發起，真正的主導者還是中共黨團。籌備委員如中央黨部楊匏安、中華全國總工會藍裕業、對外協會譚植棠、工人部劉爾崧、廣州工人代表會呂漢泉等，都是共產黨員。¹⁰⁸

工商聯合決議所揭示的十項目標，雖然提及務使罷工勝利，但其內容則完全未涉及罷工運動的進行，而主要是有利於商人的內政改革和經濟建設。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向罷工委員會表示「提出解決罷工條件之時機已到」，請其研擬罷工工人恢復工作條件。¹⁰⁹廣州中共黨團一方面為了拉攏商人，削弱國民黨右派的力量；一方面鑒於上海及各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漸趨低落，省港罷工頗有陷於孤軍奮戰的困境；而且維持罷工工人所需要的經費鉅大，財政負擔壓力日增，也希望能夠結束省港罷工。¹¹⁰國民黨中央和廣州中共黨團都瞭解省港罷工必須改弦易轍，否則將危及政權。由於有此政策上的轉變，因此當香港各邑商人聯合會代表謝樹棠等十七人到廣州，揭舉省港工商聯合、和平解決罷工的主張，才會受到汪精衛、蔣介石以及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接待歡迎。¹¹¹

工商聯合暫時化解省港罷工以來工人與商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鞏固左派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為了進一步削弱國民黨右派，中共覺得有必要把右派的

陸卓卿，商民協會許堅心、廖雲翔，商聯會鄧品三等。

¹⁰⁷ 〈中國國民黨接受工商聯合決議宣言〉，《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21日，第3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11（1925年10月），〈令〉，頁23-25。

¹⁰⁸ 〈籌備軍政學工商兵各界大會〉、〈軍政學工商大會第一次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21、22日，第6版。大會正確的名稱為「軍政學農工商各界大會」。

¹⁰⁹ 〈政治委員會召開解決罷工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24日，第6版。

¹¹⁰ 盧權、襍倩紅，《省港大罷工史》，頁258-260。

¹¹¹ 〈兩要人宴香港代表〉、〈政治會致罷工委員會函〉、〈罷工團體歡迎港商代表〉，《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30日、10月1日，第3版。

群眾奪取過來，於是開始籌劃將商民運動正式列為國民黨的政策，以厚植左派的群眾基礎。

五、商民運動

在取消特許證和單獨對英政策上，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爲了使罷工能夠持續進行，對商人做了讓步和妥協。對共產黨來說，這是一種戰略性的撤退，也是聯合商人策略的靈活運用。國民黨左派在黨中央設置商人部，向商人表明無實施共產的用意，但是初成立的廣州市商民協會，儘管有政府的支持，仍然擴展緩慢，在商人間的影響力有限。省港罷工期間，中央商民部爲了進一步推展商民運動，開始籌辦商民運動講習所，培養商民運動的幹部。

中央商民部成立以後，各地商民協會設立和成員的吸收都極爲緩慢，一方面因爲商團事件後，商人對政府和國民黨不具好感，一方面因爲國民黨缺乏從事商民運動的人才。國民黨改組以後，群眾運動主要由共產黨人操控，但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積極發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對商民運動則不重視。國民黨由於未能得到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支持，所以儘管中央商民部和廣州商民協會成立，但是商人方面的工作卻進展有限。

1925年7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商民部籌辦商民運動講習所。¹¹²此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都先行辦理講習所。設立商民運動講習所正是共產黨發展群眾運動的模式，其目的是培養共黨可以控制的幹部。鄒魯便指出，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由共產黨員譚平山主持，國民黨的組織章程，都由他擬訂；各地組織方面的人員，也由他委派。共產黨設立講習所、宣傳所等等，都是爲了「造成牠的爪牙」。¹¹³

國民黨中央設立商民部、成立廣州市商民協會時，中共便有意加強國民黨

¹¹²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147。

¹¹³ 鄒魯，《回顧錄》（南京：獨立出版社，1946），頁160。

左派和商人之間的聯繫，但是當時商民協會僅止於工具性角色。省港罷工以後，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計劃進一步推動商民運動。廖案發生，促使他們益加感到聯合商人的迫切。他們對商人妥協、讓步，換取「工商聯合擁護國民政府」。接下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商民運動決議案〉，商民運動正式成爲廣州國民黨的路線。

在進一步討論〈商民運動決議案〉前，我們有必要先對廣州政局的變化做一番描述。廖案發生後，國民黨左派在共產黨協助之下，開始肅清右派和廣東境內的敵對勢力。胡漢民因爲其弟胡毅生涉及廖案，被派往蘇俄考察。¹¹⁴身兼國民政府軍事部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省政府軍事廳長，並且在廖案後被畀以監督財政全權的許崇智，因爲和他所舉薦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鄧澤如、廣東省財政廳長李基鴻，曾與商界領袖共議，由他們組設商立銀行，籌足資本一千萬元，政府授以造幣之權。¹¹⁵並且計劃將中央銀行賴以補充基本金之印花稅、土絲稅、煤油稅等，歸爲廣東省財政廳之收入。蔣介石在政治委員會歷數許十大罪狀，其中以把持財政、破壞中央銀行爲最大罪行。¹¹⁶鮑羅廷在努力遊說許加入國民黨左派失敗後，決定將他逐出廣州。¹¹⁷由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介石發函勸其辭職離粵。¹¹⁸鄧、李同被撤職，許所部將領亦遭逮捕。國民政府任命宋子文爲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爲東征做準備。¹¹⁹11月中，廣州政府收復了惠州、潮州、汕頭等重要城市，陳炯明軍隊完全被肅清，廣東革命根據地更加鞏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籌備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意在重新調整黨中央的人事權力，確立黨的革命路線。

¹¹⁴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頁 350-356。

¹¹⁵ 〈財政當局宴請商界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9月16日，第3版。

¹¹⁶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 423、425-428；陳公博，《苦笑錄》，頁 42-43。

¹¹⁷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107-113。

¹¹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425-428。

¹¹⁹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113。

其時，早已對孫中山容共政策抱持異議的林森、鄒魯等國民黨右派，在北京孫中山陵寢前的西山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即通稱的西山會議，並在上海另立黨中央。廣州國民黨左派的黨中央，將大會延至 1926 年 1 月舉行。由於右派主要分子離開廣州，共產黨幾乎完全控制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一切籌備工作都是共產黨所規劃的，¹²⁰其中包括〈商民運動決議案〉。

〈商民運動決議案〉共八條，將商民分為不革命者和可革命者兩種。買辦商人等與帝國主義有共同利害者屬前者，應剝奪其公權，引起其他商人對之仇視；民族資本工商業者和小販商人屬後者，當促其與農工階級聯合戰線。新興工業家亦為可聯合的對象。對於現有舊式商會應嚴厲整頓，以新的商會組織法改善其組織，並幫助各地中小商人組織商民協會，分散其勢力。同時將商民協會建構成嚴密有系統的全國性組織，協助國民革命。¹²¹

〈商民運動決議案〉是由國民黨左派的中央商民部代理部長甘乃光向大會提出。¹²²但是，無論從其內容或是當時共產黨對國民黨左派的操控及影響來看，商民運動的理論主要是由共產黨提供。自國民黨改組以來，黨的群眾路線基本上是建立在共產黨所提供的理論基礎之上。1926 年 11 月，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說，共產黨對國民黨總的策略，是要加強左翼，與右翼鬥爭，孤立其中間派並使其向左轉。實際執行這個策略的方法，是利用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和策略等，對中間派的戴季陶思想體系進行嚴肅的思想鬥爭，並且為國民黨左翼制定基本理論。¹²³國民黨改組以後，農工運動已經成為黨進行革命的主要路線，現在要加入商民運動，

¹²⁰ 《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頁 131。吳時為大會秘書長。

¹²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 9 月），上冊，頁 388-393。10 月 6 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議案委員會開第一次會議時，代理商民部長甘乃光提出的〈商民運動決議案〉有十條，被刪除的兩條是對於輔助本國工商業家之方法案和設立商民部或實業部應依地方情形決定案。見〈重要議案會第二次會議紀〉，《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10 月 22 日，第 11 版。

¹²²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頁 378-379。甘乃光也在大會中報告〈商民運動之經過〉，載《政治週報》（廣州），期 6、7 合刊（1926 年 4 月 10 日），頁 65-68。

¹²³ 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書面報告（1926 年 11 月）〉，《譚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393、396-397、398-399。

自然不能與原來的理論衝突，這便需要由原來的理論提供者提出合理的說辭，使它能與工農革命的理論相契合。國民黨二大〈商民運動決議案〉對於商民運動與農工運動必然產生的衝突矛盾，採取輕描淡寫的方式，目的是祛除國民黨左派的疑慮。

在這個策略下通過的〈商民運動決議案〉，其實是符合中共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是運動商民協助工農革命所做的設計。其基本精神，是建立在共黨鬥爭的理論基礎之上的。決議案內容共八條，文字敘述洋洋灑灑數千言，多數是用來陪襯「紅花」的「綠葉」。「紅花」為何？從譚平山發表的幾次黨務報告中，不難看出端倪。

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二大前舉行的廣東省代表大會（10月20-27日）和第八次總理紀念週各級黨部代表大會（12月7日）上，譚平山都曾以中央組織部長的身分，對黨中央商民部刻正展開的商民運動工作進行簡短的報告。三次報告互有繁簡，論述的主旨則同。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中國的商人分為買辦階級和小商人兩種，前者是反革命的，後者對革命的需要與農工一樣。革命運動若全不注意商人，將來無把握可以成功，因此要注重商民運動。第二，國民革命不能以商民為領袖，由資產階級帶領，因為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力量還非常薄弱，不若法國革命時資產階級有雄厚勢力。不過，新興資產階級可以是推倒買辦階級的力量。第三，舊式商會不可做為商人運動的工具，應由商界同志組織商民協會，做為商人運動的工具，應以它們來打破官僚式的商會。¹²⁴譚以小商人與買辦階級對立、新興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對立、商民協會與舊商會對立，都是運用階級鬥爭的辦法。工商聯合政策實現時，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陳公博，曾將商人與買辦階級區隔開來，主張商人是革命不

¹²⁴ 譚平山，〈中國國民黨全國黨務概況——在中國國民黨廣東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之報告（1925年11月）〉、〈在第八次總理紀念週各級黨部代表大會黨務報告（1925年12月7日）〉、〈黨務總報告——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26年1月）〉，《譚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322-323、329、336-337；〈第八次紀念週譚部長之黨務報告〉，《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2月9日，第11版；《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頁209-210。

可缺少的階級，但認為商人無法獨力完成革命，必須與農工聯合起來進行革命。譚平山則建構一套更完整的商民運動理論。汪、陳未觸及國民革命領導權問題，譚則更進一步強調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不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國民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其用意乃強調工農才是革命的主力，小商人和新興資產階級只是輔助革命的力量。

共產黨為國民黨左派所設計的商民運動策略，最重要的實踐是組織商民協會，打倒只能代表大商人利益的舊商會。有學者指出，〈商民運動決議案〉因為是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共同議定，因此條文內容顯得曖昧不清。¹²⁵不過，細釋其意，頒布新的商會組織法，嚴厲整頓舊商會，以商民協會「作其整頓之規模」，其實還是要把舊商會改造成商民協會的形態，最終目的仍是中共主張的打倒舊商會。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在會議中也通過了一項〈商人運動議決案〉。由其內容看來，更可以證明國民黨二大通過的〈商民運動決議案〉的主要精神反映中共的主張。這項議決案首先分析中國商人在民族運動中的三個傾向，一是最反動的買辦階級，幾乎已沒有民族觀念；二是新興企業家，有一點政治覺悟和民族觀念，但仍未完全脫離買辦階級的意識，不敢公然與民眾接近；三是中小商人，多傾向革命，至少不反對革命。議決案接著闡述商人運動的策略，說：

我們商人運動之對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眾，他們是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中一重要成分。……我們商人運動之方法，乃是用商民協會等類形式，組織中小商人群眾，以圖改造現有的商會，而不是僅僅聯絡現有之商會。……我們商人運動之重要目的，是組織中小商人，尤其是

¹²⁵ 金子肇最早提出決議案兩項條文顯得曖昧不清，對商會的漸次改造是國民黨左派的主張，打倒舊商會為譚平山的主張。馮筱才則指出兩項條款互相矛盾，可能是不同的起草人所撰寫，整頓改善商會的條文可能由甘乃光或陳公博起草，打倒舊商會的條文可能由譚平山起草。金子肇，〈商民協會と中国国民党(1927-1930)——上海商民協會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號 598（1989年10月），頁 21-22；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 83-84。

宣傳中小商人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妥協賣國行動，同時也要反對中小商人出資給保護大商買辦階級的商團保商隊。……商民協會應該是純粹中小商人的組織，不加入大商。……¹²⁶

這些論述，無論是就商人群體的分析或是商人運動的策略，所傳達的意義，其實與國民黨二大的〈商民運動決議案〉幾乎完全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運動議決案〉中有下列這一段話：

在政黨的關係上，革命的中小商人，應該是國民黨左派的群眾，在任何地方我們都應該盡量集合這些群眾於國民黨，以充實其左派的力量。如果該地國民黨左派在商人群眾中已有勢力，則可經過國民黨指導商人的組織及行動。商民協會中如果有我們的同志，我們的黨團工作亦不可放棄，以圖實現我們的政治主張。¹²⁷

這便清楚地說明，中共所規劃的商民運動，其短期目的是充實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經過國民黨來指導商人的組織和行動，最終目的則是「實現我們的政治主張」。

中共聯合，或者是透過國民黨左派發展的商民運動，在實際工作推展上，除了籌設商民運動講習所，培養可以掌握的商民運動人才，並且設置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商民部，做為推動廣東全省商民運動的機關。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是中共鑒於右派在廣東仍有勢力，而且廣州特別市黨部為右派所掌握，於是在1925年11月召開廣東省代表大會，成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在中共操縱下，大會選出省黨部執行委員9人，其中劉爾崧、彭湃、楊匏安是共產黨員，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被視為國民黨左派，陳孚木是國民黨右派中的左傾分子。¹²⁸

¹²⁶ 此據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冊2，頁219-220。《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所載文字略異（冊3，頁54-55〔總頁860-861〕）。

¹²⁷ 此據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冊2，頁219-2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係據原鉛印件刊印。《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將此段文字首句刊為：「在政黨的關係上，革命的中小商人，應該是國民黨右派的群眾。」（冊3，頁54-55〔總頁860-861〕），顯然有誤。

¹²⁸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 257;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廣東省黨部商民部於 1925 年 11 月 14 日成立，由前海關監督范其務任部長。范上任僅一月餘即辭職出任汕頭市長，部長職務由秘書劉中悟代理。劉可謂是廣東省商民運動的負責人。¹²⁹在此之前，廣東省各屬商民協會直接受中央商民部指導，商民加入者甚少。¹³⁰截至 1925 年 12 月為止，廣東全省只成立了 6 個商民協會：廣州市商民協會有會員 265 人，南郊商民協會有會員五十餘人，中山縣商民協會有會員 1,315 人，中山縣小杭商民協會有會員二百餘人，深圳商民協會有會員 97 人，新洲商民協會有會員 87 人。¹³¹廣東省黨部商民部成立以後，設立商民運動委員會，擬訂廣東省各級商民協會章程，派員赴各地組織商民協會，出版《新商民》月刊，向商民宣傳革命主義。廣東各地商民協會和商民入會者迅速增加。¹³²計自 1925 年 12 月開始派員赴各地從事組織工作，至 1926 年 5 月止，半年時間，總共成立各地商民協會 85 處，會員人數三萬餘人。¹³³

廣東省黨部商民部設立後，右派掌控的廣州特別市黨部，亦對執行委員會作了調整，將實業部改為商民部，並改選各部部長和常委。孫科任組織部長、陳其瑗任宣傳部部長、吳鐵城為工人部部長、傅秉常為商民部部長、陳其瑗任青年部部長（1926 年 2 月改由謝瀛洲接任）、唐允恭為婦女部部長。常務委員為陳其瑗、潘歌雅、黃季陸。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包圍下，右派在廣州難以立足。黃季陸離粵、潘歌雅辭職，孫科、陳其瑗為左派所拉攏。1926 年 7

pp. 232. 陳孚木是與廖仲愷同時遇害的陳秋霖之胞弟，負責國民黨機關報《廣州民國日報》編輯和營業事務。見陳孚木，〈本報兩年之回顧〉，《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2 月 17-19 日，第 7 版。

¹²⁹ 王亞成，〈劉中悟先生與國民革命之商民運動〉，收入海南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海南文史資料》（海口：南海出版社，1993），頁 7。王亞成說，范其務辭職後，劉中悟出任商民部長。事實上，劉應是代理部長。

¹³⁰ 廣州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民眾訓練委員會編，《廣州民眾團體一覽》（廣州：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1929），頁 76。

¹³¹ 甘乃光，〈商民運動之經過〉，《政治週報》（廣州），期 6、7 合刊，頁 65-66。

¹³²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頁 80。

¹³³ 廣東省黨部商民部初成立時，專門從事調查商民狀況及制定各種辦事規則等工作，未嘗派人往各地組織商民協會。廣東省黨部商民部，〈廣東商民運動報告〉（1926 年 6 月 4 日），國民黨商民部檔案，編號 11049；〈省商民部報告商民運動工作之情形〉，《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8 月 6、7、12、13、14、16 日，第 11 版。

月，吳鐵城、傅秉常相繼辭職，改由陳其瑗兼任工人部部長，在思想上已信服共產黨的簡琴石（詳後）任商民部部長。¹³⁴國民黨中央商民部部長於 1926 年 2 月由傾向左派的宋子文接任，¹³⁵實際負責工作的是國民黨左派的秘書黃一鳴、幹事蕭漢宗、蕭一平、李榮滋。¹³⁶至此，國民黨的商民運動領導部門皆由國民黨左派執掌，而由共產黨在背後指導。

各地商民協會的設立和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其實質內容卻不若表象輝煌。根據當時在廣東北江負責商運工作的黃詔年的報告，北江已成立的 9 個商民協會，加入的會員成分，小販占十分之六，有店舖的小商人占十分之三，中等商人占十分之一。其中亦有少數買辦、大商、土豪、劣紳投機加入，以圖個人利益。而舊商會基礎鞏固，各級政府進行工作仍不得不以舊商會為宗，也使得商民協會發揮的功能有限。¹³⁷各地商民協會的成立，或由廣東省黨部商民部核准，或由各縣黨部商民部核准，或由廣東省黨部各屬特別委員會核准，統屬系統紛亂，亦往往引發糾紛。¹³⁸所以，由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商民運動，表面上看來似乎擴張迅速，實際成果卻遠不能和農工運動相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產黨透過國民黨左派發展商民運動，組織「中小商人」的同時，亦展開組織店員聯合運動。1926 年 1-2 月間，廣州市相繼成立了經綸店員聯合會、紗綢布疋店員聯合會、土洋疋頭店職工聯合會等。3 月，廣東省農工廳頒布店員工會組織條例。¹³⁹共產黨一面幫助國民黨左派發展商民運

¹³⁴ 《廣州市國民黨志》（油印本），頁 24。〈廣州特別市黨部四十七次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12 月 2 日，第 11 版。1926 年 8 月，謝瀛洲因病改由陳嘉謨接任青年部部長。簡琴石於 1926 年 8 月 18 日就廣州特別市黨部商民部部長職。〈簡琴石就市商民部部長職〉，《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8 月 20 日，第 11 版。

¹³⁵ 〈商民部長通告就職〉，《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2 月 11 日，第 3 版。

¹³⁶ 〈中央黨部第四次常務會議紀〉，《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2 月 18 日，第 11 版。1926 年 4 月 6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商民部長宋子文報告，該部幹事蕭一平辭職，擬改蔣壽石充任。〈中央黨部第十八次會議紀〉，《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4 月 12 日，第 11 版。

¹³⁷ 黃詔年，〈我工作商運的概況和今後的意見〉，國民黨黨史館藏商民部檔案，編號 11849-2。

¹³⁸ 朱英，《商民運動研究(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7-118。

¹³⁹ 1926 年 1 月 8 日廣州經綸店員聯合會成立。1 月 29 日，廣州紗綢布疋店員聯合會舉行開幕典禮。2 月，廣州市土洋疋頭店各職工發起組織土洋疋頭店職工聯合會。3 月，各行店員近日紛紛組織

動，一面組織店員、職工，向「中小商人」進行罷工鬥爭。農工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與商民運動之間的磨擦終究不能避免，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商民運動決議案〉，不過是刻意忽略兩者之間潛在的矛盾。對共產黨來說，支持國民黨發展商民運動，真正的目的是防止商民向右轉，是為國民黨左派造群眾基礎，是幫助工農進行革命。無論國民黨左派或是商民運動，也都只是「實現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工具而已。

六、擴大統一戰線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黨操縱下召開。大會對西山會議諸人進行懲處，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執監委員，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絕大多數。¹⁴⁰大會閉幕後，中共中央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掌握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感到躊躇滿志，共產國際則提醒面對中國北方情勢的變化以及日、英等國的新行動，對國民黨右派仍須小心應付。共產國際認為，1926年初發生的中東鐵路衝突，是日本人在中國北方活躍的表現。2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共產黨對整個國民黨應該採取的方針是，設法孤立右派，「要在不使黨感到難堪的情況下把這些分子開除出黨。」鑒於上海五卅慘案和省港罷工所掀起的國民運動漸入低潮，日、英、美等帝國主義者又開始發起攻勢，意圖鎮壓或瓦解中國的國民運動，他認為組成統一戰線，與國民黨維持團結是必要的手段。他說：

現在特別重要的是在國民黨內保持統一戰線。如果我們沒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緊密聯盟，我們就不能組成反帝統一戰線。因此我們認

店員工會，農工廳頒布店員工會組織條例。聞故衣行店員亦有組設工會之議。〈經緯店員聯合會成立〉、〈廣州紗網布疋店員聯合會開幕啓事〉、〈土洋疋頭店職工罷工〉、〈故衣行店員組工會〉，《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1月9日，第11版；1月29日，第6版；2月26日，第11版；3月29日，第11版。

¹⁴⁰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463-475。

為，最近一個時期的基本任務，不僅是保持統一戰線，而且是擴大統一戰線。我們認為，不僅需要使國民黨人加入統一戰線，而且需要使那些願意反帝的政治派別和人士加入統一戰線。……共產黨認為，在最近一個時期保持統一戰線和鞏固統一戰線特別重要，因為現在帝國主義者表現得比以前更加活躍。¹⁴¹

維經斯基提出一方面要孤立國民黨右派，一方面要和包括右派在內的各界人士組成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二大以後，發展與國民黨之關係主要的指導原則。

維經斯基的主張，在兩天後中共中央所發出的通告第七十六號中有了更進一步的闡釋。這份通告旨在指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應做的工作。在這份文件中，中共中央要求共產黨員應努力向外界說明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合作召開代表大會的正當性，一方面宣揚國民黨左派的思想 and 政策，一方面批判右派背叛國民革命。它提出共產黨對國民黨工作應採取的幾個主要策略。第一是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政策：當繼續與國民黨左派結成密切的聯盟，努力擴大左派的群眾，堅固左派的基礎，以與右派鬥爭。由於國民黨左派須依賴中共始能壯大，因此在擴大左派組織的工作中，仍當以中共為核心，擴大鞏固中共的組織。第二是左派與右派的聯合戰線：為了對抗英日帝國主義勾結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增強國民會議宣傳的勢力，應建築一民眾團體的聯合戰線，以減輕右派的反動力量。通告中說明實現聯合戰線的幾個要點：一是對右派的政策，不能籠統地把它看成與左派敵對的固定組織，更不能逼它團成一氣，要努力使他們逐漸分化。二是一方面既要反對右派，一方面又要聯合戰線，本相衝突，因此必須應用得當。聯合戰線不是注重形式的結合，而是注重增進行動的勢力。在思想宣傳上絕不能讓步，應痛斥右派的錯誤，在行動上力求合作，以壯大運動的聲勢。第三是設法抓住右派中比較左傾的領袖。第四是在聯

¹⁴¹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47-48。

合上部首領的工作中，切勿忘記藉此打入下部的群眾，取得右派下面的群眾。在擴大左派的群眾、堅固左派的基礎的工作中，應該在商人、農人、學生、軍隊、婦女各種群眾組織中，努力發展左派的區分部。¹⁴²

維經斯基和中共中央所提與左派結成密切聯盟的策略，其實是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後一貫採行的策略。擴大左派的群眾，以堅固左派的基礎，亦正是中共幫助國民黨發展商民運動的用意。1925年12月7日，胡漢民在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傳鼓動部工作人員拉菲斯談話時，拉菲斯即指出：「現在鬥爭是爭取小資產階級。在國民黨的右邊遲早會組成一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與它並列，這個黨將力求脫離國民黨，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還在跟著國民黨走的那些農民階層爭取到自己這一邊。當國民黨制定綱領時，它應當注意的正是這些階層。」拉菲斯進一步說明這個策略的用意，是「不把小資產階級推向反動派的懷抱，而要把它牢牢控制住，讓它跟著自己走。」¹⁴³拉菲斯所說的小資產階級，自然包括中小商人在內。他的談話，清楚地說明中共幫助國民黨制定商民運動政策，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商人向右轉，壯大國民黨右派的勢力。維經斯基和中共中央則進一步將爭取商人、聯合商人，做為黨實行統一戰線、聯合戰線的重要工作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共畢竟認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為免工人在革命中陷於孤立，工人應結合的優先對象，是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發展農民運動，擴大工農聯合戰線乃首要之圖。與商人聯合戰線，只可看做是完成工農革命的策略。在中央通告第七十六號發出約十天之後，中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特別會議，所通過關於共產黨主要職任的議決案，只強調擴大工農聯合戰線的重要，說「只有工人和農民的聯盟，足以引導國民革命到最後勝利。」這份議決案絲毫未提及與商人的聯合。¹⁴⁴到3月1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七十

¹⁴²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號——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我們應做的工作〉，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42-47。

¹⁴³ 〈拉菲斯同胡漢民的談話記錄〉，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760。

¹⁴⁴ 〈關於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53-57。

九號，才又特別針對這項議決案補充說明，指出這項議決案雖然強調建立工農革命聯合戰線的重要，但並非叫我們只要注意農民運動工作，「非有城市小資產階級、學生、商人之參加革命，則工農聯合戰線亦是孤立的。」¹⁴⁵這就進一步說明，中共要拉住商人等加入革命行列，不但是要拆毀右派的群眾基礎，同時也是爲了使工農聯合戰線不致陷於孤立。

中共統一戰線的策略確立後，立即呈現在對民眾的宣傳上。1926年3月，馮玉祥國民軍在與張作霖奉軍作戰中，封鎖天津大沽口，北京外交團向段祺瑞政府提出嚴重抗議。隨後因日本軍艦掩護奉魯聯軍艦隊駛入港口，雙方開砲互擊，英、美、法、日等八國公使聯合提出最後通牒，要求遵守《辛丑條約》，撤除海口封鎖。18日，北京學生、市民在中共策動下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會議，遊行請願，要求段執政下台。段下令對群眾開槍，打死遊行者的46人，打傷155人。¹⁴⁶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在背後支持馮玉祥國民軍，希望擴大北方革命勢力。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鑒於英、美、日等國有加強聯合之勢，隨即發出文件，呼籲全國民眾「無論平時有何政見不同，無論是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富商大賈、研究系、進步的軍閥官僚等等，……都應有所動作」。¹⁴⁷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決定援助國民軍，以免革命行動受到挫折，並且要「利用這次屠殺，鼓動一個全國民眾大運動，類似俄國一九〇五年冬宮請願屠殺而起的全俄革命運動。」¹⁴⁸

中共中央的上述兩項文件，都在3月20日發出。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因覺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行動有異，恐不利於己，斷然拘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多人，扣留中山艦，宣布廣州戒嚴，並且圍繳罷工委員會槍械。此即史稱中山

¹⁴⁵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關於二月北京中央特別會議〉，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83。

¹⁴⁶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京：三聯書店，1978），冊7，頁243-246。

¹⁴⁷ 〈中國共產黨爲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87-88。

¹⁴⁸ 〈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爲段政府慘殺愛國學生緊急通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90-91；亦見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頁710。

艦事件或三二〇事件。¹⁴⁹

中山艦事件使共產國際必須重新檢討中共和國民黨左派之間的問題。共產國際一向視蔣為左派，是可以利用為驅逐許崇智的力量。蔣的突發之舉，讓他們警覺到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不如想像中穩固。汪精衛的左派領袖地位受到挑戰，可能影響中共和左派的聯合。如果蔣與汪精衛關係破裂，可能造成國民黨左派嚴重分裂，導致廣州政府垮台。在吳佩孚、張作霖勢力於北方擴張之下，廣州政府內部一旦發生分裂和鬥爭，北方軍閥即有可乘之機。因此，必須加強國民黨左派的團結，以鞏固國民黨和廣州政府。¹⁵⁰因為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在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如此將「更加嚇跑大資產階級，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¹⁵¹基於這樣的考慮，共產國際採取暫時退卻的策略，斷然召回蘇俄顧問季山嘉，對蔣讓步，「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¹⁵²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立即派遣使團到廣州了解真相，提出未來的工作方針。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檢查團團長布勃諾夫（伊萬諾夫斯基）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建議，顯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最具影響。他先是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報告，其後又向鮑羅廷直接提出建議。他在寫給鮑羅廷的信上說：

國民黨左派至今在內部組織性、對群眾的影響和與群眾的聯繫方面還很薄弱。國民黨左派至今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上層組織。需要採取各種措施，通過不斷做工作來幫助國民黨加強其（學生、青年、城市商業手工業資產階級等）基層組織。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我們

¹⁴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 547；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 489-491。

¹⁵⁰ 〈穆辛關於中共在廣州的任務的提綱〉，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210-211。

¹⁵¹ 〈布勃諾夫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報告〉，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163。

¹⁵² 〈索洛維約夫給加拉罕的信〉，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177。

對國民黨的策略應該是幫助它加強內部的組織性和它同群眾的聯繫，不斷推動它在領導國民革命時同工人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繫。……¹⁵³

對於中山艦事件後革命路線的發展，他明確地指出：「國民革命勝利發展的基本條件是加強（工人階級、商業手工業資產階級和農民）三種力量的牢固聯盟。」¹⁵⁴

在布勃諾夫提出上述建議之後，共產國際代表穆辛也提出中共在廣州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擴大群眾基礎，把右派對商人和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和壟斷奪取過來。¹⁵⁵如果回顧維經斯基的言論和中共中央通告第七十六號，便知道他們的意見，正如布勃諾夫所說的，對「中國同志」來說實際上並無新義。¹⁵⁶

中山艦事件以後，共產國際和中共力圖鞏固國民黨左派，使它不致發生分裂。但蔣介石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佔重要職位，操控黨務，以及軍學等界兩黨黨員尖銳鬥爭的情況，顯然深感痛苦，尤其認為「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解決黨內的紛爭已經刻不容緩。5月15日，蔣在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提出整理黨務案，其中規定他黨黨員在國民黨中央、省、特別市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不得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他黨黨員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¹⁵⁷自此，共產黨員多數退出國民黨領導階層。由於共產國際認為中共與國民黨還不到全面決裂的時候，因此在路線上仍然延續中山艦事件後訂下的原則，繼續幫助國民黨左派加強它與商人等群眾的聯繫，擴大統一戰線。

從中山艦事件發生，到5月15日蔣提出整理黨務案期間，中共中央於4

¹⁵³ 〈布勃諾夫給鮑羅廷的信〉，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184。另參見〈布勃諾夫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同前書，頁164。

¹⁵⁴ 〈布勃諾夫使團的總的結論和具體建議〉，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249。

¹⁵⁵ 〈穆辛關於中共在廣州的任務的提綱〉，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214-215。

¹⁵⁶ 〈布勃諾夫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報告〉，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164。

¹⁵⁷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502-508。

月 15 日印製了《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工作》的小冊子發給黨員，對聯合戰線的推動，做了極為詳細的討論和指示。文件指出，五卅運動是全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向帝國主義進攻，帝國主義採取分離這個戰線的政策，不但誘使資產階級離開這一戰線，又以過激赤化恐嚇小資產階級（學生及小商人）離開戰線。由於聯合戰線破裂，導致運動失敗。要救濟這個危機，必須在一切實際工作中，努力深入群眾，獲得群眾，擴大及鞏固各階級群眾的聯合戰線，這是最重要的工作原則。否則，不但工人階級陷入孤立危險的地位，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對民眾運動也會失去熱情。聯合戰線的進行，要從民眾切身的生活出發，領導群眾對諸如米價高漲問題等日常經濟問題進行爭鬥，不可提出過高的口號嚇退群眾。要利用國民黨做為領導這些日常鬥爭的公開組織，因此對於國民黨工作應當更加緊注意。聯合戰線必須是群眾的，要努力獲得各團體的群眾，使群眾願意「與我們合作並接受我們的主張」，而不是只和他們的領袖或職員聯合，不是占領機關或多占幾個職員。聯合戰線要有共同的要求和口號，在實際活動的場合，提出的主張要切實合乎群眾的要求。聯合戰線的意義，是各方都要讓步以進行聯合。在某一時期，即使右派和工賊也是聯合戰線的對象。在某種環境或在宣傳上有必要時，用不著隱蔽「我們的面孔」，但在一般場合，外表上色彩愈灰色愈好。文件中指出：「聯合戰線有各種形式，有經常的，有臨時的，我們不可拘定一種形式。」¹⁵⁸這份文件發出後不久，中共中央又發出一份通告，提醒黨員要遵守上項指示進行工作。¹⁵⁹

中共中央的這項工作指示，提醒黨員聯合戰線的重要性，並對如何進行聯合戰線做了極為詳細具體的說明。聯合戰線必須與民眾切身的問題結合，成為中山艦事件以及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黨政高層後，中共黨員努力的方向，其目的是挽回它在廣州的頹勢。

¹⁵⁸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頁 718-722；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108-115。

¹⁵⁹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號——最近政局觀察及我們今後工作原則〉，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頁 723-726；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118-130。

七、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

中共中央關於聯合戰線工作的指示，在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成立後有了實質的進展。它是在 1926 年 5 月 11 日的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大會上被提出來的。在此之前，4 月間召開的廣東省學聯代表大會，曾經通過一項〈工農商學兵大聯合決議案〉。這個代表大會是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在背後主導，與右派孫文主義學會召開的全市學生大會互別苗頭。¹⁶⁰出席大會的代表，左派約占百分之八十，執委名單由中共團廣東區委預定，大會通過的幾個決議案，包括〈工農商學兵大聯合決議案〉，也由團廣東區委先行擬就。¹⁶¹這份決議案指出，小商人和大資本階級和工農學兵同樣受到帝國主義、軍閥、貪官土豪的壓迫，應切實聯合起來，進行革命。先由工農商兵學本身建立統一的、嚴密的組織，再組織全國工農商學兵委員會，作為求民族解放的最高機關。¹⁶²

〈工農商學兵大聯合決議案〉，提出工農商兵學本身應建立統一的、嚴密的組織，主要是針對廣州學聯的分裂而言，組織全國工農商學兵委員會只是一個空中閣樓，呼籲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也還是一個口號。而成立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則將過去口號式的宣言，轉為實際的組織行動。

表面上看來，成立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議案是在聯合大會上提出，實際上，無論工農商學聯合大會的舉辦或議案內容，都經過事前詳細籌劃擬定。大會是由廣州總商會、廣東商界聯合會、廣州市商會、廣州市商民協會四商會充當發起，歡迎同時在廣州開會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廣東省第二次農民大會、廣東全省第六次教育大會代表，再由勞動大會提議改歡迎大會為農工商教育聯歡大會。¹⁶³勞動大會代表鄧中夏在會中宣讀事先擬妥的議案，每讀一

¹⁶⁰ 〈團粵區委給團中央的報告——關於團組織的半公開和新學生社問題〉、〈團粵區委學運報告——廣州學聯糾紛經過情況〉，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2 輯，頁 343-349。

¹⁶¹ 〈團粵區委給團中央的報告——召開廣東省學聯第一次代表大會經過〉，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2 輯，頁 350-354。

¹⁶² 〈省學聯代表大會決議案〉，《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4 月 24 日，第 6 版。

¹⁶³ 〈四商會歡迎三大會代表之通告〉、〈勞動大會覆四商會函〉，《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條，各代表即起立舉手贊成，鼓掌之聲、歡呼之聲，震動整個會場。最後由出席代表一千餘人高呼工農學商聯合革命戰線、擁護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擁護省港罷工、擁護工人利益、擁護農民利益、擁護商人利益、工農學商聯合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等口號而散。¹⁶⁴這樣的會議操作模式，是中共當時舉行各項會議普遍採取的方式。¹⁶⁵

工農商學聯合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七條，乃對政府提出七項要求，其內容多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有些是民眾迫切的要求，有些是希望將來實現的要求。七條要求為：(1)取消火油專賣，由政府抽收適當捐稅；(2)由省港工商代表及廣州政府代表與香港政府代表，立即就結束罷工問題進行談判；(3)政府應擬定具體計畫，積極肅清盜匪，以安民生；(4)關於勞資間的衝突，政府應設立仲裁機關，以政府代表為主席，勞資代表各半。關於地主農民的衝突，亦應設立同樣的仲裁機關，秉公解決；(5)整飭吏治，嚴懲貪官污吏，慎選縣長和民政人員；(6)擬定辦法，切實禁止不良之徒散布謠言，以免政府威信及人民生活受損；(7)對於建築道路、黃埔開埠、改良港口、完成粵漢鐵路、普及整飭教育、增加教育經費等人民迫切希望之事，政府應盡力實施。大會決定由工農商學各界各派全權代表四人，組織工農商學聯合委員會，以促成各項決議之實現。¹⁶⁶

月 11 日，第 10、11 版。

164 〈廣東人民的要求——五月十一日勞動農民教育三大會及四商會代表聯歡大會之議決案〉，《政治週報》（廣州），期 13（1926 年 5 月 24 日），頁 5-6；〈工農商學聯歡大會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月 13 日，第 6 版。

165 中共團粵區委向團中央報告 1926 年 3 月 28 日省港青工大會的經過時，便說：「到會的同志對於鼓動會場革命空氣做得很好，所以對演講的精神及通過決議案，都是全場鼓掌，或高呼口號，尤以 CY 代表演講時為甚。」〈團粵區委給團中央的報告——召開省港青工大會的經過〉，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2 輯，頁 327。

166 〈廣東人民的要求——五月十一日勞動農民教育三大會及四商會代表聯歡大會之議決案〉，《政治週報》（廣州），期 13，頁 5-6；〈工農商學聯歡大會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月 13 日，第 6 版。馮筱才說，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決議是在全省商民協會第一次大會上作出的，這個聯合會在五月底已開始籌備。（氏著，《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頁 98。）事實上，廣東全省商民協會代表大會於 1926 年 5 月 20 日舉行開幕禮，21 日起開始正式會議，而組織工農商學聯合委員會的決議在 11 日已正式通過，故馮的記述並不正確。

工農商學聯合委員會在 5 月 20 日會議時，通過簡章，正式定名為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會址暫設總商會。委員會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省農民協會、廣東全省教育會各派代表四人，廣州總商會、廣州市市商會、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廣州市商民協會各派代表三人，及公推自由職業代表二人組成。會議主席團由各團體及自由職業各出一人組織，開會時輪流擔任主席。舉出簡琴石（自由職業）、馬伯年（廣州總商會）、原基（廣東省農民協會）、梁培基（廣州市市商會）、林麗生（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鄧中夏（中華全國總工會）、許堅心（廣州市商民協會）、陳信明（廣東全省教育會）等八人為主席團。委員會設總務部、宣傳部兩部，總務部主任簡琴石、副主任馬伯年，宣傳部正主任鄧中夏、副主任梁培基。¹⁶⁷

委員會根據 11 日的決議，發表宣言，推舉代表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請國民政府接納七項決議案。宣言中說：「我工農商學各界，惟有在擁護國民政府條件之下，獲得目前之迫切要求。」¹⁶⁸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聯歡大會中提出這七項要求，是藉以換取商人擁護國民政府。四商會也發出擁護〈工農商學聯合大會決議案〉宣言，表示：「國民革命實為吾民眾之唯一生路，吾工農商學各階級民眾，皆當一致團結，築成堅固的聯合戰線，以使此國民革命早日成功。」¹⁶⁹表面上看來，四商會對決議案一致贊成，事實上，總商會顯然對這個決議仍感遲疑。在各界推舉請願代表時，總商會被舉者皆推辭不就，請願行動因而延遲。¹⁷⁰於此可見總商會態度之曖昧。

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設立，是將維經斯基擴大統一戰線的主張具體

¹⁶⁷ 〈農工商學聯委會之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月 21 日，第 3 版。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簡章，亦見國民政府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號 36（1926 年 6 月），〈令〉，頁 54-55。

¹⁶⁸ 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宣言，見〈廣東人民的要求——五月十一日勞動農民教育三大會及四商會代表聯歡大會之議決案〉，《政治週報》（廣州），期 13，頁 7-8；〈農工商學聯合會開會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月 19 日，第 6 版。

¹⁶⁹ 〈四商會擁護工農商學大聯合決議案宣言〉，《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月 15 日，第 10 版；〈廣東人民的要求——五月十一日勞動農民教育三大會及四商會代表聯歡大會之議決案〉，《政治週報》（廣州），期 13，頁 6-7。

¹⁷⁰ 〈工農商學聯合會代表昨日赴中央黨部請願〉，《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5 月 19 日，第 3 版。

落實。它的功能，是調和農民和地主之間、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以及農工商學之間的衝突矛盾，加強各界之間的協商。把原來工農商學聯合委員會的名稱改為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也是因為中共一向提工農，國民黨一向提農工，採用「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這個名稱，較有利於統一戰線的推動。當時擔任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秘書長的譚天度，在後來憶述此事時，便明白指出這個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統一戰線工作，類似後來的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聯合委員會主要的中心任務是聯合農工商學各界一起反帝、反軍閥，「工作重點是搞商界的統戰工作」。¹⁷¹

在統一戰線策略上，委員會仍然容納商會的買辦分子，如總商會的馬伯年是日本台灣銀行買辦；商聯會的林麗生入過日本籍，是中國銀行副行長，也是買辦。¹⁷²對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則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其中以對簡琴石、梁培基的工作最有成效。簡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經理，在省港罷工中，因為英美煙草公司的煙無法在廣州銷售，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因而獲利。梁培基的發冷丸等藥物銷售亦如此。兩人都擁護中國共產黨，經常在商人內部大力宣傳鄧中夏等共產黨員的意見。¹⁷³簡在 1925 年 12 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事。¹⁷⁴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成立後，他擔任該會總務部主任，並且是主席團八名主席之一。他不屬於任何商會，自稱為自由職業者，與廣東工農領袖往來密切。¹⁷⁵1926 年 8 月接任廣州特別市黨部商民部部長。中共和國民黨左派以這些位置賦予他

¹⁷¹ 譚天度，〈南粵風雲三十年〉，收入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下略），《廣東黨史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 1 輯，頁 62-63。本文亦收入中共廣州市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大革命時期回憶錄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 99-120，編者改標題為〈大革命時期廣東共產黨的回憶〉。

¹⁷² 〈中央對於廣東市民運動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387；〈廣東區對於農工商學聯合會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392-393。在後一文件中，將林麗生誤作林嚴生。

¹⁷³ 譚天度，〈南粵風雲三十年〉，收入《廣東黨史資料》，第 1 輯，頁 63-64。

¹⁷⁴ 國民政府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號 18（1925 年 12 月），〈命令〉，頁 15。

¹⁷⁵ 〈廣東區對於農工商學聯合會問題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393。

和廣州、香港商人聯繫，動員商人提供資金支援國民革命的任務。¹⁷⁶

在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委員人數上，也有特意的安排。簡章原規定工農教各派代表四人，四個商會各派代表三人，自由職業代表二人。但是，因為四商會聯同自由職業，商人代表一共十四人，較工農學三界代表共十二人為多，其後即改為工農學界各派五人，共十五人，多過商人方面一人。工農兩界委員都是中共黨員，教育會亦可大致掌握，再拉攏幾個商人，中共可以在委員會中取得主導地位。¹⁷⁷

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成立，鮑羅廷在背後扮演重要的角色。決議案的七條要求，是鮑羅廷親自擬定。這些要求透過農工商學代表大會決議的形式提出，使它看來是發自人民自身的要求。由委員會和四商會發表宣言、報紙大力宣傳，以及由各界代表透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向政府請願，都是為了使政府認真對待這些要求。鮑羅廷督促國民黨中央黨部在 5 月 27 日將請願書交給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使政府能在 5 月 30 日頒布接受這些要求的法令。因為按照計畫，5 月 30 日這天要對國民黨右派展開行動，包括逮捕廣州公安局局長吳鐵城、免去傅秉常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建議建設廳長孫科離粵赴俄、建議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休假一段時間、內務秘書古應芬暫留原職至李濟深的兩個師離開廣州。所有這些對付右派的行動，以及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成立和七條要求的提出，都是對中山艦事件以及 5 月 15 日國民黨中央通過整理黨務案的補救措施，目的在鞏固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在廣州已經發生動搖的政治地位。」如同按照劇本演出，5 月 30 日，國民政府頒布接受七條要求

¹⁷⁶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86-187.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說，在北伐開始前，簡琴石本人及其家庭公司已與蔣介石聯繫在一起。他似乎未留意簡琴石和共產黨關係密切，簡出任這些職位也與中共有關。

¹⁷⁷ 〈廣東區對於農工商學聯合會問題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392-393。這份報告是鄧中夏所寫的，根據他的記述，原定農會、工會、教育會各派三人，共九人，後才改為各派五人。根據簡章，農會、工會、教育會各派代表四人。鄧的記述，不知是否為最早的構想，或是他記述錯誤。不過即使記述有誤，也不影響其所揭露的內情。《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所刊布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各界委員名冊，農工教三界委員各為五人，與鄧所說各派五人的說法相符，見該書，號 36（1926 年 6 月），〈令〉，頁 55-56。

的法令，當天對右派所展開的行動，完全被成千上萬的遊行者和民眾對法令的歡喜所淹沒，沒有引起任何的政治反應。孫科表示願意同他的夥伴們分手，完全和中共及左派合作，不但使鮑羅廷改變要他離粵赴俄的安排，並且接任伍朝樞請假赴滬留下的廣州市政委員長職。¹⁷⁸

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提出的七條要求，有主要和次要之分。鄧中夏後來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便說：「我們提出七條議案，不過是有紅花有綠葉，其實最重要的只是取消火油專賣、組織勞資仲裁機關，及解決省港罷工，這就可以說是紅花，其餘都不主要的，只是拿來做個配角，這就是七條議決案裡面的綠葉了。」¹⁷⁹

被視為紅花的三條要求，都是商人希望政府能立即實現的事情。其中尤以取消火油專賣最為迫切。此因自廣東省商務廳實施火油專賣後，批商只進口少量火油，任意提高價錢。在未專賣前每罐值二元五至三元，專賣後高漲到十元至十六、七元，民眾生活大受影響。而檢查苛罰，擾民尤甚。靠夜工生活的工人，皆因油貴而無工可做，痛罵政府實行專賣，甚至發生暴動情事。¹⁸⁰由於火油專賣權係由蘇聯取得，民眾亦將火油奇缺、價格昂貴所帶來的災難歸咎於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代表索洛維約夫一方面要求蘇聯駐華石油辛迪加，向市場投大量火油，一方面向俄使加拉罕建議取消火油專賣，以免危及蘇聯的聲譽。¹⁸¹

¹⁷⁸ 〈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272-274。《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載國民政府頒布法令的時間是 5 月 31 日（號 34 [1926 年 5 月]），〈命令〉，頁 21），實際頒布的時間為 5 月 30 日。鮑羅廷在這天寫的信說：「今天城裡到處都張貼了答覆這次請願的法令。」此外，邵元冲，《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26 年 5 月 30 日亦記載當天吳鐵城被捕、伍朝樞、孫科被勸離粵，見該書，頁 237-238。關於伍朝樞、孫科、傅秉常職位的易動，參見〈伍朝樞請假赴滬〉、〈任孫科為市政委員長〉、〈粵海關監督易人〉，《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6 月 2、3 日，第 3 版。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對此事亦有簡略論述，見該書，頁 503。

¹⁷⁹ 〈廣東區對於農工商學聯合會問題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391。該書收錄這份報告，並未刊載作者姓名，由於報告中有「宣傳正主任就〔是〕我」一語，可以確認是鄧中夏寫的。

¹⁸⁰ 〈廣東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之經過〉，收入《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頁 340。

¹⁸¹ 〈索洛約夫給加拉罕的信〉，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179。

可見取消火油專賣，不止是廣東商人、工人、農民等民眾迫切的願望，共產國際亦視為當務之急。鮑羅廷透過農工商學委員會請國民政府取消專賣，可謂符合各方面的期待。國民政府很快便宣布取消火油專賣，商民對於每十加侖（即每一箱或二罐）要另收特稅二元，雖然仍不滿意，不過，此項要求算是獲得實現。¹⁸²

組織勞資仲裁機構，也是商人熱切的期望。因為工人罷工頻傳，勞資衝突日漸尖銳，商人遭受重大衝擊，自然希望政府能夠排難解紛，平息風潮。而共產國際代表穆辛亦提醒中共在廣州的工作，要注意勞資衝突問題。他認為廣州的工人鬥爭有時過於尖銳，可能造成不良的政治後果，應由國民政府設立仲裁委員會加以調解，儘量避免走向罷工。¹⁸³所以，由政府組織勞資仲裁機構的要求，也是反應共產國際的意見。國民政府雖然明令籌設勞資仲裁機構，由陳公博起草組織法，並交高等顧問鮑羅廷審核，¹⁸⁴但是因為工人方面始終有意見，所以並未獲致具體結果。¹⁸⁵

解決省港罷工也是廣州商人和聯共（布）、共產國際共同的期望。對商人來說，省港罷工的經濟封鎖，使生意受到重大衝擊，早已殷切期盼結束罷工。廖仲愷被刺後，國民黨中央和廣州中共黨團認為省港罷工必須改絃易轍，香港政府也希望早日結束罷工，雙方透過廣州商人和香港華商進行聯繫，並且進行官方的接觸，但是在賠償問題上始終無法達成共識。¹⁸⁶1925 年底，中共團廣州地委已經指出解決省港罷工是重要的工作，否則將危害革命基礎，不利於革命政府向外發展。¹⁸⁷中山艦事件後，解決省港罷工益顯急迫。布勃諾夫在考察

¹⁸² 〈財政部稅務總處佈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 38（1926 年 7 月），〈附錄〉，頁 45-47。

¹⁸³ 〈穆辛關於中共在廣州的任務的提綱〉，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 215-216。

¹⁸⁴ 〈解決勞資間糾紛問題〉，《廣州民國日報》，1926 年 6 月 19 日，第 3 版。報上譯為鮑爾汀。

¹⁸⁵ 〈廣東區對於農工商學聯合會問題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頁 392。

¹⁸⁶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p. 347-348. 盧權、襍倩紅，《省港大罷工史》，頁 261-274。

¹⁸⁷ 〈團廣州地委政治報告（政字第一號）——關於形勢和團目前的任務〉，收入《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2 輯，頁 111-112。

廣州情勢後表示，省港罷工雖然使廣州在經濟上得到加強，但是罷工拖得太久，工人不滿的情緒逐漸升高，再拖下去將會給中共帶來極大威脅。他認為取消罷工是廣州中共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他的意見，也直接傳達給鮑羅廷。¹⁸⁸共產國際代表穆辛也說，香港罷工再拖延下去，可能造成罷工工人渙散和香港同廣東的鬥爭激化的危險，對整個政治軍事局勢將帶來危害，應該採取妥協來取消罷工。¹⁸⁹

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提出解決省港罷工的要求獲得國民政府接受後，廣州四商會積極推派馬伯年、梁培基二人為代表，赴港與港商接洽解決罷工事宜。¹⁹⁰國民政府下令裁撤廣東交涉署，對外交涉事務由外交部辦理。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與香港總督交涉解決罷工事宜，香港總督以「香港罷工已成為過去之事件」，只願就排斥英貨問題進行交涉。¹⁹¹其後雙方代表雖然展開談判，又因歧見陷於停頓。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10月上旬已推進到長江流域，必須集中力量支援武漢前線，不欲在省港罷工問題上與港英當局持續糾纏，中共及國民黨中央決定結束罷工。雙方最後協議廣州方面對出口貨物加徵2.5%至5%的海關附加稅，以解決罷工工人的生活問題。10月10日，罷工委員會發表停止封鎖的宣言，省港罷工宣告結束。¹⁹²

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成立後，經國民政府核准備案，成為正式的民間機構。¹⁹³它成立的目的，最初不過是藉以向政府請願取消火油專賣等事，中共

¹⁸⁸ 〈布勃諾夫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布勃諾夫給鮑羅廷的信〉，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166-167、185。

¹⁸⁹ 〈穆辛關於中共在廣州的任務的提綱〉，收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頁216。

¹⁹⁰ 〈農工商學會五次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6月5日，第3版。

¹⁹¹ 〈六月五日外交部致香港總督函〉、〈香港總督致英領署函〉，鄧中夏，〈省港罷工之中英談判〉（廣州：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宣傳部，1926），附錄，頁1-2。

¹⁹²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p. 351-353. 盧權、禰倩紅，《省港大罷工史》，頁398-410。

¹⁹³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號36（1926年6月），〈令〉，頁52-56。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於1926年8月14日遷任一德路廣仁善堂內辦公。〈農工商學會遷地辦公〉，《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8月17日，第7版。

並未將它看做是代表社會民眾勢力的遠久組織。由於仍有和商人統一戰線的功能，因此暫時保留下來。商人方面由於不瞭解這個會的背景和用意，對它仍抱期望，卻因為提不出具體的方案，完全受中共擺佈。¹⁹⁴中共始終將這個會當成工具，在革命工作需要時推它出來搖旗吶喊。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曾經計劃以它做廣東市民運動的機關，並以之為市民會議、省民會議的過渡形式，¹⁹⁵曾經對組織內部進行擴充整頓，設立外交、財政、軍事、農工、土地、教育、公益、市政、司法、民政、建設、實業等委員會，並在各縣設立分會。¹⁹⁶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廣東各地農工商學聯合會職員星散，會務無人主持，國民黨廣東特別委員會派員前往接收改組。¹⁹⁷

八、結 論

從1923年開始，中共一直希望能發展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商團事件發生，中共促孫中山以英國在背後支持商團叛亂為由，發起反帝運動，但是因為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廣州商人對政府怨恨不滿，並無法激發民眾的反帝情緒。上海五卅慘案發生，由於外國人槍殺中國人，為反帝國主義製造極佳議題，中共在上海掀起反帝運動，又策動香港和廣州沙面工人罷工，風潮持續十六個月之久。

省港罷工能夠持續，最關鍵的原因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支援。中共則一面運用廣東各界對外協會的隱蔽性組織來發動反帝，一面用罷工委員會來擴張力量。國民黨右派和廣州商人對工人勢力的抬頭以及經濟封鎖感到不滿，不願情勢完全由工人主導，以解決民生需求為由，迫使罷工委員會讓步，特許貨物進出，又進而要求更自由的經濟活動空間。在政府與國民黨右派

¹⁹⁴ 〈廣東區對於農工商學聯合會問題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390-392。

¹⁹⁵ 〈中央對於廣東市民運動議決案〉，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2，頁387-389。

¹⁹⁶ 〈農工商學會推定各主任及委員〉，《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11月16日，第7版。

¹⁹⁷ 〈農工商學聯合會之改組〉，《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4月20日，第4版。

和商人的努力，以及罷工委員會的妥協下，廣東逐漸擺脫香港的箝制，往經濟獨立的方向發展。

國民黨右派和商人對左派支持罷工強烈不滿，採取實際行動刺殺廖仲愷。鮑羅廷和中共因此調整策略，開始聯合商人、拉攏商人，以強化左派、弱化右派。中共對商人的聯合戰線策略，隨著廣州內部政治情勢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共產國際則就廣東以及全國形勢通盤考量，擬定戰略。從工商聯合，到幫助國民黨發展商民運動，到成立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有這些策略的運用，都是爲了達成工人革命的目標。省港罷工因此構成爲一幅極端複雜的歷史圖像，表面上是罷工反帝，實際上是爭奪革命領導權。

省港罷工開始時，中共利用各界代表會的名義來發動，結束時中共也是利用農工商學委員會的名義請願。無論開始或結束，中共都基於革命的需要。省港罷工拖了十六個月，工人的不滿情緒已逐漸升高，蔣介石成爲國民黨新的實力派領袖，也使中共在廣東的發展受到極大威脅。中共支持國民黨進行北伐，結束省港罷工，正是盱衡廣東和全國的政治形勢，爲革命另創新局。

Foes or Allies: Mercha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anton-Hong Kong Strike of 1925

Li Ta-chia^{*}

Abstract

In support of the May 30 Movement of 1925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stigated the Canton-Hong Kong strike in June. The labor movement then expanded in the wake of the Shameen Incident. This caused Canton and Hong Kong to impose economic blockades against each othe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CP group in Canton and Nationalist (Guomindang—KMT) governmen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KMT-left worried the KMT-right, which reflected merchants' concerns over the economy.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Liao Zhongkai, the KMT-right was weakened as the CCP urged the unity of labor and merchants while making concessions to merchants. Canton thus managed to break away from Hong Kong's interference and develop a degre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After the coup of March 20, politics in Canton were to be changed drastically, when the position of both the CCP and the KMT-left was threatened. In October 1926, whe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rmy reached the Yangtze River area and was in great need of full support from all quarters, the CCP and the KMT-center decided to terminate their respective strikes. The CCP skillfully manipulated the tactic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light of the ever-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anton. This article offer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olitical factions, workers, and merchants.

**Keywords: Canton-Hong Kong Strike, merchants, united front,
Guomindang (KM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